

爱伦堡

作家的一生

引 子

伊里亚·格里戈利耶维奇·爱伦堡（1891——1967）是苏联著名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经历的思想 and 创作道路十分曲折和复杂。在苏联作家当中，爱伦堡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而又常常引起争议的作家。

犹太顽童

一八九一年，这是俄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俄罗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亚历山大三世在粉碎民意党之后，颇有点踌躇满志了。他正自鸣得意地计划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成，不久就可以坐着火车由伊尔库茨克直达莫斯科了……然而，就在这一年，俄罗斯人民遭受了巨大灾荒，俄罗斯大地哀鸿遍野。负有盛名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柯等人，征募捐款，开设粥厂，企图赈济灾民，……就在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在基辅的一条从克列夏齐克直上里普基的陡峭的学院街上，一个未来的作家诞生了。他就是爱伦堡。爱伦堡五岁时，全家由基辅迁居莫斯科。爱伦堡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工程师，在哈莫夫啤酒厂任厂长。父亲白天工作，晚上也很少在家。他常常到“猎人俱乐部”去玩牌。爱伦堡十岁那年，父亲领他到涅格林大街的饭店去。他们坐在单间里，但爱伦堡不时地跑到大厅里，看到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正在大口地嚼着肉饼。爱伦堡原以为父亲在工作之余过着一种有趣的生活，可从那次以后，爱伦堡不再对父亲的生活抱有好奇心了。

爱伦堡的母亲是一个善良、多病而又信奉上帝的人。外公也是一个笃信宗教的老头儿。他家里严格地遵守着所有宗教的戒规。按犹太人的教规，礼拜六是休息日。在这一天，大人不准抽烟，孩子不准胡闹。爱伦堡呆在外公家里感到寂寞无聊，便想出一些花点子调皮捣蛋。有一年夏天，全家住在博亚尔卡的别墅里。爱伦堡想出种种恶作剧，扰得全家人心神不安。爱伦堡被关进了一间堆煤的储藏室里。他脱光衣服，在煤堆上打滚。等到厨娘来开门时，见他浑身煤黑，吓得大声尖叫起来。爱伦堡为了报复，甚至夜里拿了一瓶煤油，打算放火烧掉这座别墅。

小时候，爱伦堡经常和俄罗斯孩子们一起玩耍。他的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幼小的爱伦堡既不向犹太人的上帝祈祷，也不对俄罗斯人的上帝祷告。他的自尊心很强，对社会上歧视犹太人的风气愤愤不平。列夫叔叔告诉他，耶稣就是犹太人。保姆对他说，耶稣教导人们，当有人打左脸时，就把右脸也伸给他打。爱伦堡听了很是反感。当他第一次走进莫斯科第一中学的时候，一个预备班的学生挑衅地唱道：“犹太人坐在小铺里，我们把犹太佬放在大头针上。”爱伦堡立刻冲上去，照着他的脸就是一拳。从此，再也没人敢欺侮他了。那个学生很快就成了他的好朋友。

中学头两年，爱伦堡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后来，他对数学感到厌烦了，常常不及格。有时候，他把家藏的古典作家的精装本选集拿出去卖掉，用得来的钱买一些什么打喷嚏的药面、令人发痒的粉末，或是一些从其中会跳出橡皮制的耗子、蛇和小丑的小匣子——他经常用这些东西在中学老师面前闹出种种恶作剧来。

在中学课程中，爱伦堡最喜欢的是俄语和历史。语文老师常常夸奖他的作文。有一次，他在一篇作文中谈到农民的解放不应该自上而下，而应从下面发动起来，结果，校长把他父亲找去警告了一番。

没进预备班之前，爱伦堡喜欢莱蒙托夫的诗，能把诗人的《恶魔》背得滚瓜烂熟。不过，那时他还没想到要成为莱蒙托夫那样的诗人。他称自己为“放逐的精灵”，一心只想做一个飞旋在他父亲的哈莫夫工厂上空的恶魔。不久以后，诗又使他厌烦了，他又开始醉心于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他饲养了一大堆青蛙、蜥蜴、蝾螈，爬得满屋都是。可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显

显微镜旁边做实验。

爱伦堡家的客厅布置得很讲究。一棵棕榈树栽种在木桶里。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复制的油画，画的是赴莫斯科求学的罗蒙诺索夫。客人来来往往，谈论着克莉丝蔓姊妹有一副惊人的花腔嗓子；说什么莫斯科开设了一家设有雅座的摩尔式建筑的饭店；有一位马丽勃兰夫人从巴黎带来了女帽的新式样。可这一切却使爱伦堡感到无聊。他觉得工厂的庭院要比客厅有趣得多。他常跑到庭院的马厩去玩，那里散发出一股奇妙的气息。时间长了，他摸透了每一匹马的脾气。

爱伦堡来到工人们闷热而昏暗的棚舍里，只见许多人挤在一个长长的铺板上，盖着皮袄；他们喝的是发酸的坏啤酒，屋子里老鼠成患。他在这里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穷困、愚昧、肮脏。一面是有产者高谈什么花腔女高音的客厅，一面是无产者臭气熏天的棚舍——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人世间是多么不平等啊！

列夫·托尔斯泰的家就住在他父亲工厂的旁边。托尔斯泰喜欢在这一带的巷子里散步。爱伦堡自从认识托尔斯泰以后，便从家里的小储藏室里搬出了《田地》杂志连载《复活》的那几期，母亲对他说：“你读这样的书还早。”可他一口气读完了《复活》，他越发敬佩托尔斯泰了，觉得他懂得人世间的全部真理。父亲让他抄写一份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的托尔斯泰的呼吁书，他工整地用印刷体抄写了一遍，感到很自豪。

有一次，托尔斯泰来到了哈莫夫啤酒厂。他让爱伦堡的父亲领他看看啤酒的酿造过程。他们走遍了车间，爱伦堡也紧跟在后边。有人递给托尔斯泰一杯热啤酒，托尔斯泰大口地喝了进去，说道：“真香”，然后用手擦擦大胡子，对爱伦堡父亲说，啤酒可以代替烈性的伏特卡酒，这有助于禁戒伏特卡。当时爱伦堡还不理解，这个文学巨人也在时时关心社会问题，关心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所以才对酗酒这一社会普遍现象提出禁戒的办法。在爱伦堡读书期间，他在旧书摊上读到了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和库普林的作品。他每天都到图书馆去换书。他渴望理解生活，一本书拿到手总是一口气读完。他贪婪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又一次想到哈莫夫工厂工人们的棚舍，他感到，这一切都必须翻转过来。

暴风雨般的一九一五年来临了，他的童年时代结束了。不久以前，爱伦堡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顽童，而在两三个月之后，他一下子长大了。

流亡巴黎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俄国。俄国的工业危机又直接促成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成长，引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一九〇五年爆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正在中学读书的爱伦堡被这场革命风暴卷了进去。爱伦堡时常到大学生集会的神学讲堂去。那里坐着工人和学生，他们高唱《马赛曲》和《华沙革命之歌》。有一次爱伦堡也随着人群冲进院子里，开始筑起防御街垒，准备同前来镇压的沙皇警察决一死战。

这一时期，他读了列宁的文章，心中充满革命的热情。第二年，他被中学开除了，因为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当时他只有十五岁。最初，他给地下组织传递文件，后来又在莫斯科河南区担任领导人。一九〇八年秋，爱伦堡接受任务去沙皇兵营，要在士兵中间建立组织。由于缺少经验，他身上带着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市委军事组织的胶印章，就在当天夜里，警察闯进了他的家。爱伦堡被捕了，他刚满十七岁。不久，由他家设法保释候审。但他没有出庭，于同年十二月流亡巴黎。爱伦堡在登菲尔——洛歇洛广场上租下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摆出了随身带来的书籍，他一下子明白了：他将在这里长期居住下去。

巴黎，人称“世界的都会”，果然名不虚传。这里聚集着一群群各国的流亡者、流浪汉，他们之中有左倾的，也有一些思想颓废或反动的人。起初，爱伦堡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的一些政治集会，他还见到过列宁。后来他渐渐同活跃在巴黎文艺界的俄国现代派诗人巴尔蒙特、布柳索夫以及马利涅蒂、阿波里奈等人接近，埋头于图书馆里，留连在美术博物馆中，时常出入巴黎资产阶级文人的文艺沙龙，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并在这些现代派文艺思潮影响下开始了诗歌创作，从而渐渐脱离了党的组织。

一九一一年，爱伦堡自费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诗集》。象征派诗人布柳索夫在《俄罗斯公报》上发表评论文章，预言“爱伦堡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接着，又出版了《我生活》（1911）、《日常生活》（1913）、《童心》（1914）等诗集。在这些诗集中，爱伦堡写他自己的绝望心情，写他过去的的生活，写没有喇叭的号手，写陌生而冷酷的巴黎，写缠绵的爱情。他断言诗歌是一个化装舞会：“我身穿高傲的绅士衣服，期待着登上舞台的时刻，但由于导演的错误，我迟到了五个世纪。”在《蒲公英》这本诗集里，他用幻想抒情的笔调，缅怀自己不久前的过去：“没有任何人会在课堂上对我说‘听着’，没有任何人会在吃午饭的时候对我说‘吃吧’，没有任何人会叫我伊留沙，也没有任何人会给我一番温存，像母亲爱抚他的孩子。”或者：“孤零零一个人多么无聊，漫长的傍晚，无书可读。但我是个男子汉，我已十七岁了。”这些诗表达了一个远离祖国的俄罗斯青年的苦闷彷徨的心情，透露出他要在艺术中忘却苦恼，自我陶醉。这些诗在艺术上没有什么特色，大多是模仿当时流行的象征派诗人的沙龙式的抒情诗。

在回忆这一时期的创作时，爱伦堡写道：“神的概念正是我处于迷惘的那些年代进入我头脑中的！神是一个假冒的名称，在它后面隐藏着正义……我总想信仰点什么，因为我每天早上醒来，不知道这一天该怎样度过！我读过弗朗西斯·雅姆的诗。在雅姆的诗中，不仅有鸽子，而且有鹞鹰替自己辩护……有几年我想方设法想要弄明白，恶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无法接受世

界的两重性。我之喜欢弗朗索·魏尔仑，是因为他赋予人类的弱点以崇高的意义……”显然，这一时期正是爱伦堡处于极度苦闷的时期，他由于脱离革命斗争而痛苦忧郁，他企图替自己的消极和软弱寻找辩护的理由，替充溢于世界的恶寻找辩护的理由。作为一个译者，爱伦堡对待魏尔仑的态度带有他那自发的反抗性和悲观情绪，这并非偶然。同样，爱伦堡对自己同时代人——弗朗西斯·雅姆的态度也是合乎规律的。在雅姆的创作中体现出他那惟一的原则：“我的诗歌形式是由我的内心体验决定的。”这是企图避开解决生活提出的那些令人苦恼的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无法逃避，也无法与之妥协的。

记者生涯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使爱伦堡的头脑清醒了，他从资产阶级艺术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横在他面前的是令人不安而可怕的事实。战争使爱伦堡的社会政治观点起了很大变化。他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而在他的创作中，流露出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的倾向。在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间，他担任莫斯科《俄国晨报》和彼得堡《市场报》的军事记者，曾到德、法前线去采访。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生涯的开端。在前线，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他看到了战争对一部分人是苦难的深渊，而对另一部分人则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他憎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认为旧世界即将灭亡，整个世界要发生巨变，可是，他看不到改变社会和制止这场战争的社会力量。爱伦堡后来在《写给成年人的书》（1936）中曾回忆了他这一时期的心情：“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听人家说，我流露过仇恨的情绪；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由于仇恨而变得成熟了。但我看不到前面，我像一头野兽一样顺着脚印追踪……”这种迷惘的心情突出地表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爱伦堡说：“我们想要消灭那掩盖世界上骇人听闻的谎言的美。我的理想是用诗歌破坏诗歌。”诗集《前夜之歌》（1914—1916）就是他这种美学思想的产物。爱伦堡模模糊糊地预感到，这是世界发生大变动的前夜，这是世界上那些罪恶势力的终结，这是世界末日的到来：

苍穹下，人们东奔西窜。

梦沉沉，似醒非醒——

抖落了，又引来一串串……

一切都将同归于尽——

操着呓语，衰微，枯干。

（《在车厢里》，1915年4月）

村子里，狗在哀叫，

使人想到这里还有生灵。

狗为那失去的东西哀叫，

而此刻，一切都云散烟消。

一切……

（《暮色》，1915年5月）

显然，这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调。在这本写于法国的诗集中，也可以找到不少献给祖国的诗行：俄国土兵、俄罗斯田野和村庄、失掉丈夫和儿子的俄罗斯农妇……但在爱伦堡笔下，俄国——这是一个愚昧无知并充满泥泞的国家，这是一个笃信宗教而停滞不前的国家，它默默忍受着眼前的一切灾难和痛苦。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爱伦堡这个在异邦、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的游子，带着朦胧的希望，于七月间随同一批政治流亡者回到了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爱伦堡参加了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在社会保障部、学龄前教育组、剧场管理处等单位工作。但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年，他看到国内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十月革命感到不可理解，在他头脑中产生了怀疑、犹豫、动摇的情绪。这种思想倾向在《为俄罗斯祈祷》（1918）、《沉思》（1922）等诗集中都有所反映。后来，在革命现实的教育下，他对

于创造合理的新社会必须经过残酷的斗争开始有了认识。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三月所写的组诗《克里米亚之夜》里，爱伦堡仰望长空，唱出了他的心底的歌儿：这就是我，一个盲人……而现在，我要歌颂动乱的时代。他表示要跟自己的祖国一起经受考验：

我们决不离开温暖的母体，
我们决不离开苦难的大地。
谁离去——他终要归来，
但那时——两腿将沾满稀泥。

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爱伦堡还出版了几本诗集：《火》（1919）、《前夜》（1921）、《随想》（1921）、《毁灭性的爱》（1922）、《兽性的温暖》（1923）等。这些诗仍然流露出他那种左右摇摆的思想情绪。他一方面热烈而真诚地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赞扬这是“另一个伟大的世纪”的诞生；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既欣喜又恐惧”。因此，他把革命比作“血腥的风”、“清洗的篝火”，“毁灭性的爱”。

一九二一年春开始，爱伦堡作为苏联报纸记者，长期住在国外。二十年代初，他住在柏林，为《俄罗斯图书》和《新俄罗斯图书》撰写一些评论俄罗斯当代艺术和诗歌的论文，并于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俄国诗人画像》和《毕竟还是在转圈子》两本论文集。在这些论著中，爱伦堡宣传结构主义的艺术思想，主张艺术家应该脱离生活而独立。他认为，诗歌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是纯粹属于个人的东西：“我吟咏诗，这些诗是我的。”他提出，要用建筑美、机器美、桥梁美来代替艺术作品的美。他甚至把人和技术对立起来，提出了所谓“钟表和人何者更为宝贵？”这样荒诞的问题。一九二二年，爱伦堡发表了哲理性讽刺长篇小说《胡里奥·胡列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以下简称《奇遇记》）。当时，他客居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比利时的一个海滨小镇里亚潘。他住在一间窗户开向大海的小屋子里，从清晨直到深夜不停地工作着。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爱伦堡便写完了《奇遇记》，速度之快就好像有人在口授而他只是笔录一样。爱伦堡后来回忆说：“有时手写累了，我就到海滨散步。狂暴的海风吹翻了咖啡馆空旷的露台上的椅子。海似乎是毫不妥协的。这种景色很适合我的心境，我觉得我不是拿着笔在纸上写字，而是端着刺刀去冲锋。

《奇遇记》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时期欧洲和俄国的复杂的生活；谴责了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揭露了战争，揭露了那些战争犯子的残酷、贪婪和伪善；讽刺了那些为军队祝福的牧师的假仁假义，那些讨论“人道的杀人方法”的和平主义者以及企图为骇人听闻的流血辩护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谴责战争的基调，在他后来的著名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里得到了更充分、更深刻的发挥。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在读完《奇遇记》后，高兴地对她说：“这个，你知道，就是蓬头鬼伊里亚（爱伦堡的绰号）。他写得不错。”这部作品曾长时间受到苏联评论界的批评。爱伦堡对此一直不服。《奇遇记》是爱伦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说，它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这部作品体现了爱伦堡在二十年代初的复杂矛盾的思想，如：否定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人受到社会的压迫和摧残；世界是一片混乱，帝国主义战争是乱糟糟的事变，是一个张开了大口的深渊；革命社会的铁的纪律、作为它的基础的意志和思想逻辑，都是对人、对人们的爱、欢乐、感情生活的毫无道理的生硬的束缚。在小说中，教师胡

里奥·胡列尼多本来是正面主人公，作者却把他写成一个怀疑主义者。小说对欧洲人民的描写也极为软弱无力。从艺术上说，书中有许多多余的情节，没有经过加工和提炼，语言虽然朴素，但有时显得生硬而笨拙。反映在《奇遇记》里的思想矛盾，在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另一些作品中，则变为革命义务与个人情感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对立了。如《尼古拉·库尔波夫的一生和毁灭》（1923）、《让娜·涅依的爱情》（1924）等。

这一时期，爱伦堡在创作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并有所突破。在《十三枝烟斗》（1923）《德·叶·托辣斯或欧洲灭亡史》（1923）等作品中，爱伦堡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加强了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并开始注意表现正面劳动者的形象。

新的起点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爱伦堡思想上发生新的变化，创作上出现新的起点的阶段。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爱伦堡曾多次回国考察，感受到苏维埃政权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崇高的威信，体验了苏联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革命热情，因而创作出像《损公利己者》（1925）、《在普罗多奇内胡同》等反映苏维埃现实生活的小说，肯定了革命的伟大力量，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反面人物的讽刺形象。但是，在这些作品中，还看不到强有力的正面英雄形象。

一九三一年，爱伦堡在西欧各国旅游，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狂活动。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认识到只要法西斯势力存在一天，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的斗争终不可免。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从而使他从固执的和平主义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一九三二年回国后，他访问了莫斯科——顿巴斯铁路和库兹涅茨克等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地，亲眼看到了祖国工业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对苏维埃国家前途的信心。这对他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他的创作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在这个时期写的长篇小说《第二天》（1933）和中篇小说《一气干到底》（1935）里，第一次以苏联社会现实为题材，以建设工地和北部伐木场为背景，描写了苏联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场面，展现了他们忘我劳动、一心为集体的精神面貌。从三十年代起，爱伦堡的创作思想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方面来。在一九三四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爱伦堡谈到艺术同生活的密切联系，艺术在政治生活和教育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并表示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爱伦堡作为《消息报》记者多次到西班牙访问，并于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作为苏联的反法西斯作家的代表两度出席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关于法西斯的特写、散文、小说和诗歌。如长篇小说《人需要什么》（1937）、短篇小说集《停战以外》（1937）、诗集《忠诚》（1941），表现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在《我们的口粮》、《我的巴黎》、《西班牙》等特写中，爱伦堡比较真实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困苦生活。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爱伦堡当时正在法国巴黎，他亲眼目击了巴黎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沦陷，并以此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1941）。在这部小说中，他试图探究法国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战败的所谓“法兰西悲剧”的政治、历史、道德的原因。他在《在第一天》（1941年）这篇文章中指出：“我看到了巴黎的沦陷。它的沦陷不是由于德国人不可战胜。它之所以沦陷，是因为变节和胆怯毁掉了法兰西……”后来，他又以战争为题材创作了《暴风雨》（1947）和《九级浪》（1952）。这三部作品具有一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构成了“战争三部曲”，真实地再现了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和苏联的广阔历史画面。其中，《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分别获得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八年的斯大林奖金。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开始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爱伦堡以记者身份到过前线许多地方。一九四一年八月，他到了勃良斯克附近的前线阵地，随后又来到了莫斯科城下保卫战的苏联红军中。在那些战斗十分艰苦的日子里，他到过基辅、戈梅尔、勒热夫；他曾随

先头部队首先进入明斯克、波罗金诺；他亲眼目击了在维尔纽斯进行的巷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他的身影活动在德国的许多地区，直到最终攻克了柏林。在战争期间，爱伦堡以锋利的笔触，写了大量内容丰富、立意深刻、富有文采的战地评论和通讯。爱伦堡几乎每天都在报纸（《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及《前线军报》）上发表政论文章和特写，揭露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歌颂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奋起斗争，鼓舞他们必胜的信念。这些热情而又论述精辟的政论在苏联和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爱伦堡赢得了世界声誉。它们后来收在以《战争》（1941—1944）为总标题的三部政论集子里。加里宁同志曾讲过，“……爱伦堡的文章在我们的鼓动文学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爱伦堡是在跟德国人进行肉搏战，他对敌人左右开弓。”一九八二年我国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戈宝权等同志翻译的《爱伦堡政论通讯集》，其中很多文章就是这个期间写的政论、通讯和报告文学。

一九四九年四月，爱伦堡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保卫和平大会。他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表达了苏联人民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我们拥有比一切原子弹更强大的武器——人的觉悟。和平对于我们宝贵，因此我们珍爱它。我们珍爱和平并非因为我们软弱可欺，而是因为我们热爱和平的，而我们热爱和平，正是因为我们强大有力”。可以说，坚信人民的觉悟和先进思想的巨大力量，坚信人民为争取自身幸福而斗争必将获胜——这些就构成了爱伦堡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的主旋律。战争使爱伦堡在思想和创作上成熟了。

“解冻文学”

一九四一年六月巴黎陷落以后，爱伦堡结束了长期的驻外记者的生涯，重新回到祖国。卫国战争胜利后，爱伦堡在从事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委员会委员，并以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份，到欧美各国参观访问。但就在这一时期，爱伦堡的政治观点和文艺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前后起，苏联国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发生剧烈变化。一九四八年苏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和讲话；一九五二年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上，马林科夫和法捷耶夫都就文学的典型问题作了发言；随后，《真理报》和《文学报》都发表了专论，批评了过去创作中的“无冲突论”。而至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国内的形势则急转直下，这在苏联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有强烈的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反映得尤为突出。这个时期，苏联文学界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潮蜂拥而起，有关文学作品和文艺问题的争论连绵不断，有的争论和批判规模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

在苏联文学界的这场争论和思想斗争中，爱伦堡非常活跃，而且参与“发难”最早。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就写了一篇《谈作家的工作》的长篇文章，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与当时苏联传统的文艺观点截然相反的文艺主张，但当时他感到不合时宜，一直犹豫不决，未敢公开发表。直到一九五三年十月，这篇论文才在《旗》杂志上发表出来。据当时苏联报纸报道，苏联文艺界许多人不同意爱伦堡的这些观点，《旗》杂志也声称要发表一些文章同他进行辩论，但是后来这些文章未见发表。

一九五四年五月，爱伦堡在《旗》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轰动了苏联社会。不久，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在各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国际展望·和平月刊》上先后翻译连载了这部小说。于是，在国外又引起了普遍注意。西方评论界十分欣赏这部小说，称它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先声。在他们看来，这部小说的发表是苏联文学发展的划时代的标志，因此，他们常常用“解冻”来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文学中的自由化思潮。

当时，苏联国内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对这部小说发表了各种评论和意见，毁誉兼有，褒贬不一。有的指责它诽谤现实，有的赞扬它“给一个重大题材打开了大门”。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七日、二十日的《文学报》连续发表了西蒙诺夫的长篇文章《爱伦堡的新的中篇小说》，对小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小说对苏联生活，特别是文艺界的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爱伦堡不服，紧接着在同年八月三日的《文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康·西蒙诺夫的一篇文章》，反驳了对他的批评，并借用西蒙诺夫批评他的话，说西蒙诺夫的文章对“我们的文学来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

以《解冻》发表为标志，被西方称为“解冻文学”时期的作品从此源源不断地出现，如：柯涅楚克的剧本《翅膀》、佐林的剧本《客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特瓦托夫斯基的长诗《华西里·焦尔金游地府》，尼古拉耶娃的《前进中的战斗》，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等等。不过，苏联文学界一直不承认“解冻文学”这个说法。西方评

论界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就我们的理解，“解冻”思潮主要指斯大林逝世后十年中，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些揭露苏联社会阴暗面，反斯大林化，要求创作自由，向西方靠拢的趋向。这里所说的反斯大林化，不单是指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而是把斯大林的名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爱伦堡又发表了《解冻》第二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一本《诗歌集》。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间，爱伦堡几乎连年不断地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文艺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必要的解释》、《司汤达的教训》、《〈玛林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拉维娅〈罗马故事〉序》等。他在这些论文中对文艺和社会某些现象提出了不同看法，这在苏联文学界又一次引起了争论并受到批评。爱伦堡或者进行反批评，或者置之不理，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九五九年，《文学与生活》报以《艺术的规律》为题，发表了爱伦堡与该报记者的谈话。这篇文章的思想与他过去的《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的论点大体一致，因而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爱伦堡还是不服，再次写文章反驳并再次为《解冻》辩解。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爱伦堡写作并陆续发表了内容庞杂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共六部）。在回忆录一开始，爱伦堡就谈到了他写作本书的宗旨：“我将叙述各自独立的人物，各个不相同的年代，间杂以某些未能淡忘的旧日的思虑。看来，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许多我认识的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幻想家、冒险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名字是人们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编年史的编者，所以这只是做肖像画的尝试。而且那些事件，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也试着不去按照历史的顺序叙述，而是结合着我的渺小的一生，结合着我今天的思想来叙述”。在这部回忆录中，作者对一九一五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六十余年的时代生活，对俄国、法国、西班牙、美国、印度、中国等许多国家的事件和生活，以及他所说的“政治家、作家、幻想家、冒险家”作了描写和主观上的评价。书中对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描写十分生动，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是，爱伦堡在书中对斯大林、马雅可夫斯基等历史人物，甚至对中国，都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攻击。这部回忆录在当时苏联国内又一次引起了争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爱伦堡在莫斯科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中短篇小说

《十三枝烟斗》

一九二一年，爱伦堡作为苏联报纸记者长期驻在国外。作为一个记者，他有机会接触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亲身感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和堕落。因而，这个时期，他在创作中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加强了，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分析也尖锐了。这种批判倾向，不仅表现在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讽刺长篇小说《胡里奥·胡列尼托及其门徒奇遇记》和《德·叶·托辣斯或欧洲灭亡史》里，而且反映在他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一九三三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十三枝烟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十三枝烟斗》是由十三篇各自独立但又互相联系的短篇小说组成。小说集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一系列的小说不是由一个主人公的活动线索来贯穿的，而是通过一个小小的道具——烟斗，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场景和各式人物组合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舞台的背景上，爱伦堡像是一个高超的导演，利用这个奇妙的小道具，让小说中各种各样的角色登场，演出了十三出各有特色、富有哲理意味的小戏。当你看完这一幕幕小戏，闭目沉思的时候，你会惊异地发现，作家是那么巧妙地以烟斗为线索，从各个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批判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

这本小说集由十三个短篇小说组成，每一篇小说的标题都是《第×枝烟斗》。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其中写得比较好的三篇。

《第二枝烟斗》无疑是这本小说集里写得最好的一篇。故事是围绕泥水匠路易·卢一家祖孙三代的不幸遭遇展开的。路易·卢生在巴黎。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他才十七岁。他清楚地记得，他像一只小鸟似地等着爸爸带回吃的来。可是爸爸只有一枝步枪。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路易·卢跟着爸爸去游行，还听见爸爸他们唱着歌，大声叫喊着：“要面包！”近卫军冲过来了，把爸爸抓走了。路易以为近卫军准是要给爸爸东西吃，所以尽管天色已晚，还是跟着他们去了。他们来到了圣马丁门旁边的露天咖啡馆。这里坐着无忧无虑的阔太太和几个穿戴时髦的花花公子，喝着颜色像红宝石的露酒。其中一个女人喊道：“你们干嘛把他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就在这里让他们领走他该得的那一份得啦……”一个近卫军举起枪来放了一枪。爸爸大叫一声倒了下去，那个女人却哈哈大笑起来。路易紧紧抱住爸爸的两只脚，尖声大叫起来。那个女人又开口了：“把这个小狗崽子也毙了吧！”但是，邻桌的一个花花公子不同意，他说：“毙了他，往后由谁去干活？”路易的一条小生命就这样留了下来。路易长大后，像他爸爸一样，也干了泥水匠这一行。他身穿溅满灰浆的平绒裤子，头戴宽边平顶软帽，嘴上叼着粘土做的烟斗，和千万个工人一样，老老实实，尽心尽意地干活，盖了一幢又一幢极漂亮的房子。可他自己夜里却躺在圣东安郊区黑寡妇街一个臭哄哄的小房间里。在失业的日子里，路易便把洒在衣兜底的烟末刮出来，或是在街上捡些香烟屁股来填入自己那个用粘土做的烟斗，叼着它，沉着脸，在圣东安郊区的几条街上来回转悠。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老婆另外嫁人，给他扔下了一个两岁的儿子保尔。当普鲁士人入侵法国的时候，他和千千万万个泥水匠、木匠、铁匠一道去保卫美丽的巴黎城。皇帝下台了，法国成了一个资产阶级

共和国。一天早上，路易接到了一道命令，要他离开大炮，回到黑寡妇街去。被人叫做“共和国”的那些人，把穷凶极恶的普鲁士人放了进来。满城的墙上都贴着命令，限令工人交出枪支。路易和其他工人一样，不肯交枪，他们拿起枪走上街头，开枪射击。那些有钱人急急忙忙拉着贵重东西，纷纷逃向凡尔赛。不久，历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工人们扬眉吐气了。那些花花公子和阔女人不甘心把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交给穷工人掌管。于是，一场搏斗开始了。路易带着小儿子，叼着烟斗，又动身上文森炮台去守卫了。炮台里一个看水泵的工人送给小保尔一个用粘土做的新烟斗，让他吹肥皂泡玩。保尔常常学着爸爸的样子，神气十足地叼着空烟斗，大家瞧着他这副模样，便亲热地对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公社社员。”国民自卫军中尉埃蒙尼扬在望远镜中看见了这个小保尔，便对他的未婚妻加布莉埃里说，公社社员多么残暴，有一个男孩叼着烟斗在开炮。

文森炮台上只剩下三个工人了，其余的全已战死。埃蒙尼扬指使士兵打起白旗表示讲和。路易他们上当了，被三个叛民打死了。中尉命令活捉小保尔，押去给未婚妻看。保尔看见他面前的是一个巴黎最漂亮的女人。这个女人想起过去赶集时看见的一种游戏：在一间板棚里，里面挂着很多用粘土做的烟斗。有几个烟斗飞快地转动着，让青年人开枪去打。于是，她举枪瞄向小保尔的烟斗。枪响了。在世界上只生活了四年，最喜欢用粘土烟斗吹肥皂泡的保尔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五十年后，一个法国老人把这枝烟斗送给了爱伦堡并讲了上面那个故事。

爱伦堡对巴黎公社社员是充满敬意的。一九一九年五月，他曾参加了在公社社员墙附近举行的示威。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队伍的前列是公社的参加者；他们的人数还很多，精神饱满地向前行进。在我的眼中，他们已经是年迈的老人了；每逢我想到公社，就仿佛是翻开了古代史的一页——要知道，这已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在公社社员墙旁边我看见了列宁；他站在一群布尔什维克中间，瞧着那堵墙壁——似乎公社社员要从石头里走出来了。”

因为作者对公社社员怀有无限热爱和敬佩的感情，所以，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塑造了一个憨厚、质朴、可爱的公社社员路易·卢的动人形象。他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一直坚守岗位保卫自己的公社。后来，由于他轻信了敌人的谎言，中了敌人从背后射来的子弹而牺牲了。路易的形象显示了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这篇小说是爱伦堡描写正面普通劳动人民形象的开端。

苏联现代著名作家费定在谈到这篇小说时指出，“这是给法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简短的判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主题。路易的父亲为了生活下去，参加了工人们“要面包”的游行，被打死了。路易本人为了保卫巴黎，抗击普鲁士侵略者，最后不是死于侵略者的枪下，却被法国资产阶级暗害了。凡尔赛军官的情人——一个自称是巴黎最漂亮的女人，为了消遣开心，竟把一个只有四岁的天真活泼的小保尔枪杀了。请看，这就是法国资产阶级残酷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凶残面目！爱伦堡用一种不事夸张、平淡自然的手法，表达了他对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愤怒和憎恨，抒发了自己对巴黎公社，特别是对像小保尔一样的儿童的同情和热爱。

《第四枝烟斗》篇幅很小，只有五千多字，但写得却十分生动、紧凑，揭露得也入木三分。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法边境。两军对峙，而敌对双方争夺的只不过是一块三不管的地段，人称“猫的走廊”。这块土

地被炮弹炸得疮痍满目，废弃的战壕纵横交错，这里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煤，有的只是腐烂的尸骨和生锈的铁丝，但是人们却不惜任何代价想把这块土地据为已有。法国司令部宣布说，他们是为自由而战，而德国人企图掠夺煤铁；德国司令部宣布说，他们是为自由而战，而法国人也企图掠夺煤铁。就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这天夜里，法军一一八加强团农民出身的士兵彼耶尔接到命令，让他沿着被称为“猫的走廊”的战壕爬到德国阵地前沿去侦察敌人的岗哨的位置。而德军八十七后备营也派出了农民出身的彼得去侦察法军岗哨的位置。两个人在“猫的走廊”里相遇了。两个敌人相邻而卧，谁都不想互相残杀，但又清楚地知道残杀是不可避免的事。此时，彼耶尔正吸着自己的烟斗。彼得张着嘴，贪婪地吸着烟草冒出的烟气。彼耶尔知道，这是渴求吸烟的表示，便用嘴把烟斗递过去。彼得用牙把烟斗叼了过来，就这样，两个敌人彼此交替地吸着烟斗，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烟没有吸完，火却熄了。两个人厮打起来，一个掐住另一个的喉咙。烟斗跌落了，陷在泥土中。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这块浸透血液的土地变成了某某私人的合法土地了。人们在“猫的走廊”的末端发现了两具紧紧相挨的骷髅和旁边的一枝烟斗。

一枝普通的烟斗把两个普通人的生命和命运就这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们民族不同、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前世无冤，近日无仇，都有自己亲爱的家园，结果都来充当炮灰而无辜地死去。他们本来是素不相识、国别不同的普通的农民，但他们的命运却都不如一枝烟斗。战争结束了，烟斗依然完好无损，而这两个年轻的生命却消亡了。作者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是在告诉人们：罪恶的战争夺走了人的生命，普通人的生命还不如烟斗活得长久。作者就是这样通过一枝普通的烟斗的故事，使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和罪恶。作者在小说结尾不无感慨地说道：“为了称量人这粒小种子生长的坎坷，是否能制造出这样一架天平：在一个盘子上盛万千的岁月，而在另一个盘子上盛大兵的一枝小烟斗所能燃烧出的分量？”这是在为人的生命价值呼喊，也是对帝国主义战争发出强烈的抗议。一枝小小的烟斗导演出这样一出发人深醒的精采的小戏，不能不使我们对作者高超的技巧表示由衷的钦佩。

《第八枝烟斗》讲的是船长古斯塔夫·欧里逊的烟斗的故事。欧里逊是丹麦进出口公司一艘吨位不大的远洋海轮“玛丽雅”号的船长。他在这艘海轮上工作了十二年。十二年来，一枝象牙嘴的黑色小烟斗一直叼在他的嘴上。没有烟斗，便没有欧里逊，没有欧里逊，便没有“玛丽雅”号。他没有情人，更没有妻子，他深深爱着的只是大海。他领略并战胜过海洋上的种种风暴，可是一场突然袭来的爱情风暴却把他彻底地摧垮了。

那是在他工作的第十三个年头。一个自称是罗新奥里的年轻人找到奥里逊，提出要搭乘他的货轮到美洲去，而且还有他的未婚妻詹札涅塔。他想娶詹札涅塔。詹札涅塔想要一条价格昂贵的绿宝石项链。他从伯父那里偷了三十万法郎，逃了出来。他答应给船长欧里逊十万法郎。他哭着请求船长说：“船长！您是远洋轮的船长啊！爱情——这是风暴！救我一命吧，船长！”船长不能对此拒之不理。他靠了一个名叫乔的哑巴黑人水手的帮助，在夜里偷偷地把那两个人安置在他自己住的小舱房里。

到了第三天晚上，欧里逊决定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两位乘客。当他走进舱房，看到美人詹札涅塔那半裸的皮肤白嫩的身体时，他竟不知所措了。一个

钟头以后，当他站在船长台上，嘴里叼着烟斗沉思的时候，一个罪恶的计划在他脑子里形成了。那是两个星期以后，“玛丽雅”号离目的地里约热内卢只差一百海里了，此时它正在穿越一片互相连贯着的岩石陡峭的荒岛。他对罗新奥里撒谎说，有人告发了他们，上岸时警察要进行严格检查。这样，必须趁天还没亮，用舢板船一个个把他俩送上岛，先把他载过去，然后再来接詹札涅塔。船长欧里逊靠着乔的帮助，把罗新奥里摆渡到小岛上，然后又把他带到一个山洞里，告诉他说，他欧里逊爱上了詹札涅塔，你就呆在这里等死吧。船长觉得罗新奥里很可怜，便把自己的烟斗和烟口袋留给了他。

就这样，欧里逊占有了詹札涅塔，并根据她的请求，离开了“玛丽雅”号，来到了巴黎。詹札涅塔一天到晚总是一丝不挂地躺在旅馆的床上，欣赏自己雪白的肉体。她也不放欧里逊出去，并要求他扔掉烟斗。有一天，詹札涅塔告诉他，她要生儿子了，必须给她买那只价值十万法郎的蛇形钻石手镯。这一年来他已花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现在手头上只剩下罗新奥里给他的十万法郎了。手镯买来了，而他却成了一个穷光蛋。他开始痛恨詹札涅塔，便不告而别，乘船来到了那个荒岛上。他在山洞里找到了罗新奥里的遗骸和旁边的烟斗。他把这具骷髅绑在小船桅杆上，把烟斗嵌在牙齿之中。几天后，“玛丽雅”号的水手发现了这条小船，弄到了那枝黑色烟斗，在烟嘴里找到了一张纸条——那是船长写给他未出世的孩子的遗言，劝告他的儿子常呼吸大海的气息，切莫迷恋女人。他自己留在荒岛上死了。可是纸条已无人送了，因为詹札涅塔在他离开巴黎的当天晚上，便和旅馆经理列别同居了。

这篇小说是以船长欧里逊的一枝黑色烟斗为线索贯穿全文的。欧里逊为得到美人詹札涅塔杀死了无辜的罗新奥里。而他自己最终又被这个女人弄得倾家荡产，最后孤独地饿死在荒岛上。作者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可是，这里没有忠贞不渝的热恋，有的只是情欲的发泄和满足，有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可以说，那个整天一丝不挂的美人詹札涅塔正是资产阶级爱情的象征。在受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根本没有什么纯真的爱情可言。有了钱就有一切。“爱情”成了可以买来买去的商品。詹札涅塔可以爱上罗新奥里，因为他给她买了价值十万法郎的绿宝石项链。罗新奥里被害了，可她无动于衷，便跟欧里逊同居。当欧里逊被她弄得一文不名的时候，她抛弃了他，又去跟旅馆经理同居。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爱情”！有钱便有“爱情”，没有钱便丧失“爱情”。船长欧里逊通过自己不幸的“爱情”遭遇，认识到资产阶级女人的可憎。不过，他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他告诫那未出生的儿子不要接触女人。爱情是人类社会中万古永存的一种现象。人人需要爱情，男人要爱女人，这本是十分正常的。然而，欧里逊却把人世间的爱情悲剧完全归咎于女人和爱情本身上面，这就偏颇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这种畸形的关系和爱情的虚伪，其罪恶根源当然不在女人，也不在男人对女人的爱情，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人和爱情都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商品。这正是“导演”爱伦堡要给予我们的启示。这篇小说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十三枝烟斗》是爱伦堡二十年代初的作品，它反映了作家在这一时期对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思考及初步结论。爱伦堡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谴责，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其中也夹杂着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东西。这种隐蔽的思想倾向到五十年代以后，便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许多涂有浓厚的和平主义色彩的作品中。

《一气干到底》

中篇小说《一气干到底》是爱伦堡在一九三五年写成的，那一年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年。作品以苏联北部伐木场为主要背景，展示了苏联人民在艰苦条件下改造大自然的巨大场面，突出表现了青年一代的迅速成长。

故事发生在苏联北部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

轮船顺着河流航行，拖着编成木筏的木材。驳船上放的是纸浆材、桅杆材和木柴。整个辽阔无比的河面上都堆满了木材。

那天夜里，对于伐丽雅和弥琴采夫来说，是个极为美好的夜晚。

伐丽雅从弥琴采夫身边走开几步，垂下眼睛轻轻地问道：

“别佳，你说，你相信我吗？”

弥琴采夫大吃一惊，他甚至呆头呆脑地眨起眼睛来。他嘟哝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你说，你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还有什么？”

这时伐丽雅欢快地跑到他跟前，挽住他的手，两个人旋转起来，好像在跳舞。

“你问‘还有什么’吗？‘还有’工作。你看，六点钟了。我马上就要到厂里去。我现在第一件事就是到厂里去，因为我的名字已经上了红榜。”

弥琴采夫笑笑说：

“你真是少有的不爱说话的姑娘。你心里不高兴，可是让你说说为什么——你又不说。就是关于红榜的事，你也一声不响。人家也没有法子给你道喜。我就不会这个样子。伐丽雅，我什么事儿都要对人说的，现在我要告诉大伙儿……甚至告诉这些木板……”

他们俩望着一堆堆的木板。当然那不仅仅是木板，这些木板本来是一片树林：以前它们身上还长着树枝，而且在不久以前，在一小时以前，当它们还是树木的时候，它们帮助弥琴采夫和伐丽雅倾吐了怎么也说不出口的话语。弥琴采夫笑着说：

“这么说来，木板同志！……我和伐丽雅的事儿……以及其他的事儿……总之，你们自己是明白的……”

早晨，林业出口管理局里寂静无声。局长高鲁别夫注视着插满五颜六色小旗的地图。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高鲁别夫拿起听筒喊道：

“什么？拦水坝决口了吗？”

一分钟后，高鲁别夫发出的“堵住维什涅茨基拦木坝决口”的指示沿着电线奔驰着。

这时弥琴采夫正和其他共青团员一起走着。他们急急忙忙赶到河边，必须堵住拦木坝的决口。今天早晨天气很好，还不太热，呼吸很轻快，他们都露出了笑容。对于夜间的惊扰、对于危险、对于那无情而又万分危急的工作，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干这种工作的时候，甚至歌声都停止了，只听见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动。在过去的抢险过程中，他们当中有人牺牲了生命。有的人死的时候才十八岁，有的二十岁或者二十五岁。当时人们用红布把他们裹起来，抑制住眼泪很严肃地把他们安葬了。他们牺牲了，但是他们仍然和其他人并肩前进。共青团员们知道：必须赶快到拦木坝上去，不能让一根木材漂

到海里……

他们唱着歌，经过旅馆门口。现在他们还能歌唱，待会儿——等到那里水深及腰，笨重的木材车需要用足力气推的时候，那就没有工夫唱了。弥琴采夫走在最后。他脸上流露出愉快的神情。这时候，他没有想到伐丽雅，但是伐丽雅已经及时坚决地投入了堵维什涅茨基拦木坝决口的工作。她并不觉得这件事比在木板堆旁接吻还要忧郁而困难。

决口堵住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耿尼亚和廖利娅闹翻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耿尼亚既是工程主任，又是突击队员，还当共青团小组长。现在又忙着搞发明——好像他样样都能发明，可是审查的时候却通不过。后来他又学完德文。他读了很多书。他样样都要知道，就是时间太少。他准备迎接不同凡响的伟大生活。他相信他将来一定是一个领袖。而现在第一步就是要做共青团书记。廖利娅怀孕以后，他说：“你永远也不能叫我相信，为了这个玩艺儿就得浪费整整一年时间。女人的特点我真不懂。不过你要养，你就养吧。总而言之，这是你的事情。”廖利娅走到角落里，转身坐下来缝衣服去了。可是她的肩膀在颤动：她哭了。

后来她生下一个女孩。耿尼亚风尘仆仆地从第八工区跑回家，一进门就喊：“是个女孩吗？好极了！叫什么名字？达莎？噢，把你的达莎给我瞧瞧……”可是他对达莎连看都没有看一眼，马上就谈起他在堤坝设计图上发现四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普罗宁争辩过，可是耿尼亚“抓住了他的小辫子”。边区委员会书记摇晃着他的手说：“耿尼亚，没有你，什么事情也搞不出来……”

不久，达莎病了。廖利娅对他说：“你到药房去一趟。我已经照方配好了。不过要快点！”耿尼亚飞奔而去。他抓完药快到家时，他遇到了弥琴采夫。弥琴采夫是大家公认的模范，很可能由他来当共青团书记。耿尼亚把他当成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劲敌。所以，当弥琴采夫提出要处理团员古达柯夫时，两个人便争执起来。他突然想起：女儿病得很厉害，必须赶快去送药。廖利娅正在门旁穿衣服，要去找他。她从他手里夺过药瓶，低声说：“到俱乐部去争论吧……”耿尼亚没有答话。四天后达莎死了。廖利娅也离开了他。耿尼亚发狠警告自己：绝对不要想起这件事情！他还年轻力壮。

耿尼亚没有什么朋友。米夏说他是“自以为是的家伙”。他心想：我只不过跟大伙不同，我向往伟大的生活……

有一次，他到共青团员宿舍去看了一下，他看见一个女人抱着吃奶的孩子。他心想：共青团员的宿舍就是他的骄傲。难道能因为一个女人，把这一切都化为乌有吗？他对巴伊柯夫说：“同志们，既然是共青团员的宿舍，那就应当遵守制度。”巴伊柯夫告诉他，他一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孩子刚生下来，他征得大家的同意才搬来的。可是耿尼亚坚持自己的意见：模范宿舍绝对不能弄得这么不像话。巴伊柯夫走到他跟前，低声说：“你和老婆离了婚，别人就不该活下去吗？”于是耿尼亚就说：“巴伊柯夫，那么我的房间就让给你吧，我住在这儿。”他说罢就匆匆离开了宿舍。他心里觉得有点不自在。

过了几天，耿尼亚决定到克兰茨那儿去。克兰茨对他说：

“我明白，根据党的政策，你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要在市委把问题提出来。你很有才干。应当进技术学院。你的知识不够……”

耿尼亚站起来，没有告辞就出去了。他恨这个矮胖子克兰茨：真是官

僚主义者！他为什么把我耿尼亚和别人一律看待呢？……

他去找局长高鲁别夫。高鲁别夫劝他不要生克兰茨的气，他是一片好心。高鲁别夫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你是个好样儿的小伙子。但你的虚荣心很重：既是突击队员，又是发明家，什么都搞。你应当量力而行。你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你好像躲在堡垒里，这里面没有温暖，而且对党也没有多大好处。要和大伙儿打成一片。不要像你现在这样——我行我素……”

耿尼亚没有想到，在市委举行的讨论候选人资格的会上，他由于嫉妒弥琴采夫当选团委书记，而信口说出伐丽雅隐瞒富农出身，这给弥琴采夫和伐丽雅都带来了痛苦……

这样的情况是在一次简短的谈话以后马上开始的。弥琴采夫走到伐丽雅身旁问道：

“伐丽雅，关于你父亲的事是真的吗？”

他希望她大叫一声：“不是！”可是伐丽雅回答说：

“是真的。”

这时弥琴采夫摊开了双手，他仿佛要冲过这一片浓雾似的暮色奔到伐丽雅心里去一样。他几乎喊了一声：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伐丽雅那长长的睫毛不停地扇动着。她沉默了一阵才回答说：

“你还记得那天在河边的谈话吗？当时你谈到过富农问题。我问过你：‘相信我吗？’你说：‘相信。’我以为你自己知道了。后来你一次也没有提过。彼佳，我告诉你，难道是我选择他们吗？我选择的是你呵。我一听到别人谈论他们，我就吃惊：‘亲人’——原来就是真正的异己分子！我觉得他们可怜——这是事实，难道因为这一点，就要责备我吗？彼佳，我不是罪犯，我是共青团员……”

可是她这一番话并没有传到弥琴采夫的耳朵里。他认为伐丽雅欺骗了他，她并不爱他。伐丽雅眼眶里满含着泪水，她依然那样文静、那样诚恳地回答说：

“不，倘若说我想隐瞒什么人的话——那不是想隐瞒你，而是想隐瞒命运。我需要的是幸福……”

几天后，伐丽雅对弥琴采夫说：

“上级派我到别里柯夫拦木坝上去。我们只好分开了。我们最好分开一两个月，以后我们会和好的……”

在拦木坝上度过了两个月，伐丽雅长大了，健壮了。她不仅手脚变得更加有力，而且心灵也成熟了。她的照片登在《红色浮运工人报》上。她在小屋里照照镜子，不自信地端详着晒得通红的、风吹雨打的面孔：彼佳恐怕也不认得我了！他会说：“这是哪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呀？……”

一天夜里，伐丽雅由于思念弥琴采夫，久久不能入睡。她索性披衣来到河边。突然，她发现；大堆大堆木料从河的上游冲下来。拦木坝弯曲了，开始移动。伐丽雅不知怎的跳到水里去抓木头，但随即转念一想：愚蠢！一个人怎么能干得了？……她跑去打钟，发出了警报。人们赶来，伐丽雅和大家一起去抢救。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时间很快过去了。木料没有流走，拦木坝也保住了。伐丽雅没有休息，她在河边洗过脸以后，立刻就到工作台上去了。

弥琴采夫也一直在思念伐丽雅。不过，怀念伐丽雅并没有妨碍他工作，反而鼓舞了他，高鲁别夫对他说：

“贮林场有四万立方公尺出口木材，要是十八号以前运不出去，那就完蛋了！木材全要当柴烧。”几天后，弥琴采夫带领共青团员们消灭了堵塞河道的事故。他们清出了一点河道，圆木就飞快地漂走了。一立方公尺一立方公尺的木材像四月里的雪堆一样渐渐消失了，木材不见了，河岸出空了。共青团员们胜利了！

四天以后，弥琴采夫已经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他老早就作了会面的准备。现在他知道该对伐丽雅说些什么话。他首先得承认是他自己的错，就是他问得不妥当！然后他谈谈这段时间里他反复考虑的问题。

当他打开小门的时候，他倒担心起来：万一她不在呢？他已经很习惯这么想，她来了，她等着他，再没有什么事能使他们分离了！他呆了一会儿，伐丽雅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

“彼佳！”

他跑上楼。他们发疯似地，迫不及待地互相拥抱起来，好像惟恐再过一会儿，他们又要分离似的。他们笑着，幸福和羞涩的情绪使他们的面孔涨得通红。这对年轻人幸福得彼此不好意思面对面地站着。

弥琴采夫在街上遇见了拎着旅行包的耿尼亚。耿尼亚说他要到莫斯科去学习。临别时，他非常恳切地和弥琴采夫握握手，这倒使弥琴采夫不好意思起来。

“你将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共青团书记！”耿尼亚说。

耿尼亚是为了发明才到莫斯科去的。他进了工厂。白天他拚命工作，晚上还去上课。他不搞金属加工而去搞无线电，他不参加共青团会议而注意戏院的脚灯。夜里，他专心读书。他知道只有一条出路：想个办法出人头地。他设计了一种新的收音机构造。他获得三百卢布奖金，但是设计没有采用。

他在一本德文杂志上看到一篇有关绳索桥的论文，受到了启发，便研究起来。他一直干了四个月。然后他把设计图寄到科学研究所。他等回音等了很久。谢格洛夫教授终于唤他去了，十分诚恳地对他说：

“您很有才能。不过不能这样乱用精力。一般说来，这个设计在我国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我们不生产这种绳索。您瞧，设计上也有错误。您现在必须学数学……”

他从教授那里出来以后，他不知道该上哪儿去，那天晚上他觉得特别孤独。他想去找女友维拉，可是这副脸色又怎么好去呢？他认真回顾了他的生活道路，最后决定到人烟稀少的伐加赤岛去接受最严格的锻炼，做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给维拉写了一封真诚的长信，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表白了他对维拉的真挚的爱情。维拉反复读着耿尼亚的信，泪水从她眼睛里涌出来了。

几天后，耿尼亚在伐加赤岛接到了维拉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听到了维拉那满含深情的声音：

“喂，耿尼亚！我是维拉……是你的妻子。耿尼亚，你明白我的话吗？我等着你。好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站在旁边的库辛柯看到耿尼亚接完电话十分兴奋，便问道：

“你怎么啦？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是不是听到有趣的消息了？”

耿尼亚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他只是走到库辛柯跟前，握住他的手，这

会儿，耿尼亚那双绿莹莹的眼睛里充满了幸福。

在《一气干到底》这部作品里，爱伦堡着力塑造的是年轻一代的动人形象。他们尽管性格和生活道路不同，但最终都在改造大自然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本书主要人物之一，共青团员耿尼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能干、诚实、工作充满热情，可是他虚荣心很重。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但“他又知道确定祖国命运的伟大理想。”他有才干，但在集体中，他过分突出自己，对待别人的过失也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使他和集体的关系不正常。因此，他在集体中是孤立的。火热的生活磨练了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决心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读完全书，我们觉得，耿尼亚身上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还是一个可亲可爱的共青团员的形象。爱伦堡正是通过耿尼亚的形象，鞭挞了个人主义的思想，同时又用耿尼亚的转变向我们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里，青年一代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必然会战胜个人主义思想。

另一个正面主人公是弥琴采夫。他是优秀的共青团员，为人谦虚公正，热爱集体，在工作中一贯走在前面，成为青年们的学习榜样。爱伦堡通过弥琴采夫的形象，显示出苏维埃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由于这种理想的支持，使得弥琴采夫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也能毫不畏怯。显然，弥琴采夫的形象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时代青年中的典型人物。

爱伦堡还用很大篇幅描写了伐丽雅、维拉等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如何摆脱家庭影响，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成长为一代新人的感人事迹。

在艺术上，爱伦堡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内心独白等手段，充分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

《解冻》

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写于一九五三年；第二部于一九五五年完稿。小说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单行本，对原作有删节。

小说《解冻》的基本情节是在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展开的。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提出揭露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批判“个人迷信”。可以说，《解冻》和“解冻文学”就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路线变化的必然产物。

在伏尔加河沿岸一个城市的工厂俱乐部里正在召开读者座谈会。工程师柯罗捷耶夫在发言中批评小说中的农艺师祖布佐夫爱上自己同事的妻子——一个喜欢卖弄风骚的轻佻女人。他认为，作者这样写祖布佐夫的私生活不真实，是在追求廉价效果，不是典型现象。柯罗捷耶夫很善于讲话，他的发言博得了一片掌声。只有厂长茹拉甫辽夫的妻子莲娜没有鼓掌。柯罗捷耶夫感到一阵内疚，他偷眼向莲娜望去，可是莲娜根本没有看他。

从俱乐部出来，柯罗捷耶夫在风雪中迷迷茫茫地走着，眼前老是浮现出莲娜的面影。他感到她再也不会离开他的生活了。但他又想到必须控制住自己。

柯罗捷耶夫今年三十五岁。他是一位聪明、谦虚、受人尊敬的工程师。一九三九年秋，他在中学最后一年读书时，他的当农学教授的继父维鲁宾被捕了。第二天，他的好朋友米沙像害怕瘟疫似地躲开他。继父和母亲刚刚结婚一年，所以，母亲哭着说：“与你有什么相干吗？”他去当了工人。他没有恨谁，也没有脱离群众，他又交上了新朋友。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抓紧时间学习。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上了前线，负过伤。在前线他爱上了女通讯兵娜塔莎。可是，就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天，她在德国城市的一条街上被地雷炸死了。从此，柯罗捷耶夫没有再谈恋爱。他从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来到这家工厂当了工程师。他到厂只有两年，但工作很出色，被选为市苏维埃代表。

柯罗捷耶夫经常到厂长茹拉甫辽夫家去研究工作，认识了厂长的妻子莲娜。莲娜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在一所中学当教员。她和茹拉甫辽夫结婚已经五年多了，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舒罗奇卡。莲娜总想跟丈夫谈谈对爱情的看法，谈谈生活的目的，谈谈什么是幸福。但是茹拉甫辽夫总是打断这个话题，说他要工作，日子一长，他们之间渐渐产生了裂痕。

茹拉甫辽夫在战争期间上了前线，打了三年仗，表现很勇敢。战后他被派到这里当厂长。他虽然才三十七岁，可他已经明显地发胖了，开始谢顶了。他的声音中常带有命令语气。有一次，总工程师叶果罗夫来了，面如土色，很吃力地说：医生已经断定他妻子得的是癌症。莲娜听了差一点哭出来，而茹拉甫辽夫却说：“不要难过，会好的，如今的医学能创造奇迹。”一分钟以后，他就问叶果罗夫：“请告诉我，咱厂给斯大林格勒制造的机床进度怎么样？人家已经催过三次了……”夏天，有一次，市委书记当着莲娜的面对茹拉甫辽夫说：不能让工人们永远住在破草房和工棚里呀，修建住宅的经费不是去年就拨下来了吗？！茹拉甫辽夫却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要是没有精密铸造车间，我们早就丢脸了，这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的时候，不是您第一个向我们祝贺的吗？职工住房嘛，您多余操心，这些房子的寿命可能比你我还要长些咧！我看见莫斯科有些房子比这些还要

破。”从这些事情中，莲娜得出结论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己主义者，缺少感情，不关心人的生活，因而同他疏远了起来，而对柯罗捷耶夫产生了好感。三年前曾纷纷传说要撤他的职，他往莫斯科跑了两趟，事情就过去了。关于茹拉甫耶夫的工作是好是坏，人们的看法不同。有些人说他是形式主义者，明哲保身。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很好的行政领导。不过，既没有人极力攻击他，也没有人热心地为他辩护，他就是不使人对他产生强烈的感情。对上级领导，茹拉甫耶夫认为：他们喜欢听喜报，如果不给他们送蜂蜜而送辣椒，他们会生气的。不管反对茹拉甫耶夫的人说些什么，工厂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六年来从未发生过一次完不成任务的情况。

莲娜觉得她看透了自己的丈夫。特别是一年前她和丈夫的一次谈话，对于他们的关系的破裂具有决定性意义。事情是这样的：小女儿舒拉奇卡病了，请来了厂医院医生薇拉。薇拉检查过小女儿的病情后说，是普通流感，肺部一点问题也没有。莲娜听了高兴得很，但由于心绪很乱，无意中就把脑子里担心的事脱口说出：“您不会弄错吧？她的呼吸好像有些不正常。”薇拉勃然大怒：“如果您不信任我，何必叫我来？！”莲娜涨红了脸，急忙说：“请原谅，我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的确没有想使您生气……”听到这些话，薇拉含着泪水，说到了《真理报》上的那条消息。那是一九五三年一月报上发表的关于揭露了一个由许多著名医生组成的所谓“暗杀集团”——“恐怖分子医生小组”的消息。这一“暗杀集团”案件后来波及了各地的许多医生。薇拉也受到了怀疑，所以，薇拉听到莲娜不信任她的话很反感。莲娜再次向她道歉，一直把薇拉送回家。从此，她们成了好朋友。

也就是从那天晚上起，莲娜才产生了对丈夫的蔑视。那天茹拉甫耶夫回家很晚，又累又饿，问了问舒罗奇卡的病情。莲娜就提起了薇拉的事，但他却默不作声。莲娜坚持说：“不，你说说看，难道这不叫人气愤吗？与她有什么相干？”茹拉甫耶夫说，薇拉是个好医生，不过，过分相信他们也是不行的。这是无可争辩的。莲娜默默地走出房间。她心中长时间积聚起来的一切苦闷一下子都爆发出来了。她流着眼泪重复地说：“他——这人就是我的丈夫！……”

莲娜因为有孩子，一直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毅然带着女儿离开了茹拉甫耶夫，和女医生薇拉暂时住在一起。

薇拉今年四十三岁了。丈夫在卫国战争中牺牲，母亲和妹妹被德国鬼子打死。她现在孤身一人，工作很认真，但性格孤僻。她默默地爱上了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斯基，两人都有共同不幸的遭遇，但他们彼此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既感到幸福，又为不能明确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受着痛苦的煎熬。

索科洛夫斯基是一个受到群众爱戴和领导信任的人。他曾参加过卫国战争，是一个老党员。他好讲些讽刺人的话，喜欢挖苦人，脾气有些古怪。以前他在乌拉尔某工厂工作，因为把那里的厂长大骂了一顿，厂长就把他整了个不亦乐乎，甚至报上还登了讽刺他的小品文。他的妻子带着女儿跟一个比利时人跑了，这也成了他的罪状，说他里通外国。来到这里以后，他仍然对周围的一切现象不满，看到工作做得不好，秩序混乱或对人态度冷淡等现象，他就勃然大怒。这时他会大骂工会主席没解决工人食堂的问题，食堂里一团糟；骂厂长茹拉甫耶夫不关心工人住房，房子眼看要塌了。有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工会主席提起建筑三栋宿舍楼的问题。索科洛夫斯基表示赞同，并说早在一九五二年就该开始。这时茹拉甫耶夫气急败坏地说，精密铸造车间

的建设是经总局批准的，这是为了全民的利益，至于工人的住房，现在盖也不迟。索科洛夫斯基既然清楚这一点，那么他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就“纯粹是恶意煽动”！索科洛夫斯基则心平气和地回答道：“茹拉甫辽夫同志显然对党组织的作用没有认识……”茹拉甫辽夫对此怀恨在心，他背后散布谣言中伤索科洛夫斯基，说他根本不是什么老党员，“历史上有污点，家属住在外国……充其量只能对他信任百分之五十……”柯罗捷耶夫听了这番话很反感，但他认为，现在不是茹拉甫辽夫能够陷害人的那种时代了。

近来，索科洛夫斯基似乎不那么攻击人了，以致茹拉甫辽夫满意地想：“索科洛夫斯基老了，性格温和多了……”如今，索科洛夫斯基常常看着报纸自言自语地说：“写得对！”不久以前，总工程师叶果罗夫向他表示对厂长的不满，他笑了笑，说：“我看茹拉甫辽夫快被撤职了。”他接着谈到最近关于鞋的问题和锅的问题的决议，认为说得非常正确，“是希望人们能过好日子啊……”

索科洛夫斯基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茹拉甫辽夫对要来暴风的天气预报充耳不闻，结果三排木工棚在暴风中的倒塌了。他因而被撤去了厂长的职务。索科洛夫斯基听到厂长对他的陷害后，病情大大加重了。随着风暴的过去，厂长的下台，他第一次从病床上起来，走到窗前，看了一下灰色的松软的雪，他想：“春天就在眼前了”，“街道上另一边的冰柱已在淅淅沥沥滴水”。第一部完。

党委正在开会。柯罗捷耶夫刚刚从疗养院回来，听到会上有人指责索科洛夫斯基，他心里很难过。他们的交往并不很深，但他十分尊重这位总设计师。柯罗捷耶夫心里想：“讨论索科洛夫斯基设计方案时我正在休假，真遗憾。萨夫琴柯说，设计意图倒是很有意思的。都是索科洛夫斯基那坏脾气把事情搞糟了。他是个很出色的设计师。一年来同他一起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茹拉甫辽夫编造出一套荒唐的故事想陷害他，说他把家属送到比利时去了。茹拉甫辽夫是任何龌龊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何况他又恨索科洛夫斯基。我当时就对他说过，我一字都不信……不，现在这种人不能得逞了，情况不同了……不过，索科洛夫斯基的作法也太过分了：怎么能擅自退出业务会议呢？太任性！一定要大家接受他的方案。要知道，新厂长高洛万诺夫和总工程师叶果罗夫也反对呀！既然这样，他就该让步才对。而他却把门砰地一摔，还说了些粗鲁话……”

三个月前，当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设计时，谁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个样子。原来是为了给伏尔加河沿岸一家大工厂生产金属切削机床的事。不错，萨伏诺夫当时就曾把索科洛夫斯基的建议称为“可怕的冒险”，那是在厂长办公室说的。本来，萨伏诺夫一向是反对索科洛夫斯基的建议的，这一点，按理说，索科洛夫斯基似乎早该习惯了。可是这一次他却失去了自制，谈起了死板公式、永远落后，并且对着萨伏诺夫激动地说：“技术比您的思想进步得更快，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这时，厂长高洛万诺夫便维护萨伏诺夫，指出：“把业务上的讨论变成个人攻击，没有道理。”高洛万诺夫说，他并不否认用电侵蚀加工法处理零件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工厂有自己的专业，况且订货单位也没有要求这种机床；他还提醒说：“创造精神必须和应有的谨慎态度结合起来。”并说从前在乌拉尔的工厂工作时，“有些看来很有希望的建议，用掉了大量资金，结果却证明行不通。”这时索科洛夫斯基冒火了，他不再继续为自己的方案辩护，却对厂长大声说：“您太使我吃惊

啦，您只从自己这块小天地着眼，不考虑订货单位的利益。像您这样谨小慎微是不会有前途的。因循守旧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大得多……说起来都难为情——生活在原子时代，人家在创造奇迹，而您还抓住这种老掉牙的机床不放……”

高洛万诺夫之所以尖锐地批评了索科洛夫斯基的设计，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了萨伏诺夫的话，而是想听听总设计师究竟怎样答辩。每当他迟疑不决的时候，总是这样，希望引起辩论；所以那些不大了解他的人往往感到惊奇：他怎么又拥护自己原先反对的意见呢？其实，索科洛夫斯基和新厂长一起工作一年了，该已摸透了他的脾气，知道激动没有用，必须尽力说服厂长，说服了，他自己就会给萨伏诺夫以反击的。可是这一次索科洛夫斯基没有反驳厂长的意见，而只是简短地说：“您再想想吧，去问问订货单位。设计方案摆在那里，道理不言自明。”高洛万诺夫冷冷地说了一声：“好，我们再想想。”大家都看得出他是对索科洛夫斯基生气了，虽然使他发火并不容易：他永远那么心平气和，这是谁都知道的。

刚来接替茹拉甫辽夫的职务时，他想，厂里一定杂乱无章。可是，他发现工厂的生产搞得很好，工程技术人员很精炼，生产计划一直按期完成。人们指责前厂长的是，他忽视住宅建设，而且，一般地说，对工人需要漠不关心、不公正、骄傲、粗暴。来到新岗位后，他首先加速了住宅建设，撤换了厂内零售商店的经理，从莫斯科搞来六辆新型大客车，解决工厂新村和城市之间的交通，并且争取到把医院和产院的大修工程列入了第二年的计划。总之，凡是他的前任没能或没想做的，他都做到了。

现在，一年过去了，不但生产计划完成得很好，而且人们也变得快活了，振作起来了，工作中的同志式亲密感情更深了；业余时间笑声、知心的谈话和爱人们幸福的低语也更多了。或许正因为这样，有人称为“仙鹤年代” 的那些年所留下的某些令人痛心的痕迹才显得特别刺眼吧。

党委会开会时，索科洛夫斯基沉默不语。他腰板挺直，坐得很高，不时忧郁地把烟嘴往桌子上轻轻敲敲。要求他申诉理由时，他只是简短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当然要服从纪律，但是他认为厂领导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沉默一下，他又气呼呼地补充了一句：“那样的决定既不正确，也不合时宜，而且简直没有头脑……”

厂党委书记奥布霍夫认为，在上次业务会议上，索科洛夫斯基擅自退出会场，五天不上班，是做得过分了。他决定找市委工业部长特里佛诺夫商量一下，而特里佛诺夫则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可迟疑的？不能不制止他……”所以，现在奥布霍夫提议给索科洛夫斯基以警告处分。

在表决时，柯罗捷耶夫觉得：不应该委屈索科洛夫斯基。可是，除了安德烈耶夫和萨夫琴柯之外，全都赞成给处分，自己也就勉强举了手。

他回家后情绪很坏，吃午饭时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吃，说头痛。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便全都对莲娜讲了。莲娜惊奇地问道：

“那你为什么赞成？”

柯罗捷耶夫从来没见过莲娜这个样子。那双往常是朦胧而温柔的眼睛严厉地直视着他，嘴唇微微颤动，仿佛在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什么……

“我也不知道……”

阳光早已穿过窗帘射进来。它先是在天花板上闪烁，接着就飞下来，在床头小桌上转了几个圈子，最后唤醒了莲娜。她拉开窗帘，嘴角上露出一丝

笑意。她觉得一切都既简单，又不寻常——春天、丈夫、生活。

只是现在莲娜才懂得什么叫爱情。她觉得和茹拉甫辽夫一起生活的那些年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一场噩梦。已经觉醒的激情、尚未消耗掉的温柔，可以说还是少女般的惊讶和三十岁的女人的充沛的感情——这一切足够柯罗捷耶夫受用了。有一次，当莲娜在他身旁朦胧欲睡的时候，满心幸福的柯罗捷耶夫若有所思地对她说：“冬天难道能够设想冰雪下面的东西吗？……”莲娜醒过来，搂住他说：“我已经不记得冻僵后怎么缓过来的了。”

一年来，小女孩已经离不开柯罗捷耶夫了。虽然莲娜同她谈话时，总是把柯罗捷耶夫说成“米佳叔叔”，可是舒罗奇卡却固执地说：“他是我爸爸。”也许是女佣人杜尼亚暗地里教给她的，也许她自己决定把他当成爸爸。有时候，莲娜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米佳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对舒罗奇卡更能推心置腹。”这虽是玩笑，但也不无几分妒意。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白雪温存地覆盖着忧伤的、被掘开的街道——市苏维埃终于决定把这条路铺成柏油路了。沃洛佳取出那幅不成功的画稿，一直坐着画到黄昏。然后，他把画面转向墙壁，下决心说：今天是星期天，可以去看看索科洛夫斯基。

沃洛佳是老教师普霍夫的儿子。他本来是个有天赋的画家，但他幻想荣誉和金钱，专门给“先进生产者”茹拉甫辽夫等人画像，在艺术上粗制滥造。为了钱，他可以去为农业展览会画鸡鸭鹅狗，为鱼罐头画商标和广告。他说：“有思想，人家并不给钱！有思想只能使自己倒霉。”他感兴趣的是什么主题最“有现实意义”，谁的作品得了奖或受了批评。当然，沃洛佳知道他在粗制滥造，他在给索科洛夫斯基的长信中也谈到自己道路的错误，可他又无力自拔，深深地苦恼，认为大家都在粗制滥造。最近一个时期，沃洛佳一直感到精神上惶惶不安，尽管他的作品在地方报纸上受到了称赞。他有时也想像萨布罗夫那样，画一些真正的艺术品，可是，那谈何容易！他心里想道：爱情、幸福、生活——这一切都被我白白放过去了。我幻想过什么呢？大概只是奖金。接着，他又自我安慰地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如今的时代就是这样。画的如何并不重要，主要的是要把主题选对头——不能早一年，也不能迟一年。如果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反对酗酒的运动，那你最好画上这样一幅画：喝醉酒的父亲拿着钥匙想开门，却对不准门上的锁眼，而他那戴红领巾的小女儿正站在旁边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批评家总是希望八面玲珑的。只要你稍微专心于绘画艺术，他们马上就会叫起来：形式主义还魂了！崇拜色彩！习作习气！客观主义！……人们是既不探索，也没有激情。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真是个艰难的时代！”

沃洛佳以为萨布罗夫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他想错了。的确，萨布罗夫夫妇仍然住在那窄小破旧的房间里，屋里油画堆得更多了；他们的开支基本上也还是由格拉莎的微薄薪金来维持。但是，萨布罗夫的生活中却发生了许多变化。

一切都是从萨夫琴柯在展览会上看到一张风景画和一张妇女肖像后开始的。萨夫琴柯觉得这两张画极不寻常。他想起从前在沃洛佳家见过萨布罗夫，于是决心去拜访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在那间小屋里，他在许多油画前面长时间地站着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微微地笑笑。最后，他说出了一句话，也正是格拉莎时常脱口而出的那句：“令人叫绝！……”

后来，萨夫琴柯带来了安德烈耶夫；他们又请得主人的同意带了别人来。

这样，现在每到星期天萨布罗夫夫妇的房间都挤满赞叹不已的来访者。

萨布罗夫由衷地欢迎客人们，热情地同他们长谈。但是，对待人们的称赞他总是很谦虚，有时就说：“我倒不很喜欢这张，开始时还不错，后来给我弄坏了。”或者说：“您看，明暗没有处理好……”他身上有一种崇高的谦虚的品质，而这谦虚又包含着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所抱的信心。他认为，真正的绘画艺术永远能够为人所理解，因而他应该作的不是去追求人们的承认，而是工作。

来访者的赞叹在格拉莎身上引起的反应就不同了。住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这些都从来没有使格拉莎感到难过。但是，无人珍视，甚至无人知道她丈夫的作品，这是她所不能甘心的。从前，她曾幻想发生奇迹：忽然接到一封电报，请萨布罗夫到莫斯科去；或者，她打开报纸一看，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艺术家的诞生》……她虽然并不喜欢沃洛佳，认为他善于钻营取巧，但她还是时常想起沃洛佳那次突然来访：当时沃洛佳承认他嫉妒萨布罗夫……

因此，对格拉莎来说，星期天便成了庆祝公理胜利的日子。赞赏的目光、人们接触到真正艺术作品时那种深深的沉默——这些她已期待了多少年啊！

一个星期过去了。谁也没有对薇拉提起党委会的决定。一天晚上，薇拉想：索科洛夫斯基怎么这些天一直没来？是他生气了，还是工作太忙？她决定去看看莲娜。从莲娜的话里她才猜测出，索科洛夫斯基可能出事了。一出莲娜家门，她就不顾一切地朝前跑去，顺着黑暗的、空荡荡的街道跑向索科洛夫斯基住的那所房子。

薇拉进门便问：

“出了什么事？”

一看见薇拉进来，索科洛夫斯基立刻眉开眼笑了。可是，他立即又皱起了眉头，不得不和盘托出了。

索科洛夫斯基讲到他的设计方案、他在会议中途退场、党委会的处分……不过，他强调说，这都是小事情。他主要关心的是他的设计方案，他认为，不应该因为他脾气不好而否定他的方案，这会给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他的语气是那么坚定而自信，倒使得薇拉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

“可是，你为什么总要瞒着我？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他走到她跟前，抱住她，立刻感到一种内心的宁静，这正是他许多天来一直在幻想的。

“岂止相信！我的整个生命靠你支持着……别生气，薇拉！我是不愿意让你难过，就是因为这个才没去看你。你知道吗，我多么想去啊！”

薇拉这才笑了。

“你什么都懂——懂得你那些机床，懂得植物学，懂得绘画。可是，我这个人对你来说却是一本没打开的书。莫非你真的看不出来吗？对我来说，和你一起难过也是幸福。我想以你的生活为生活，你懂吗？”

索科洛夫斯基看到薇拉的眼里含着泪水，他亲吻她那湿润的面颊，目不转睛地久久地望着她。她宛如一个初次体验到爱的喜悦和爱的痛苦的少女。

她留在他这里了，直到次日早晨。她临走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沉思了一下，说：

“从前，我觉得为爱情而斗争仿佛只是青年时代的事，而且也只有初次倾吐衷曲之前。其实，并不然。终生都要为它而斗争，要维护它，不使它

受屈，怀抱着它通过一切，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直到死……薇拉，我的爱！……”

新市委书记杰明到任后，处处关心人，他说：“生产就在于人。”他亲自调查了解索科洛夫斯基的设计方案，不赞成对他处分。在党员大会上，大多数人一致反对党委会关于给予索科洛夫斯基警告处分的决议。索科洛夫斯基以他那渊博的知识、勤勤恳恳的工作和一颗富于同情的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第二部完。

《解冻》这部小说的标题“解冻”二字的含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指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解冻”，一是指艺术创作方面的“解冻”。

首先，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爱伦堡把它划分为两个时期：茹拉甫辽夫和高洛万诺夫时期（实际指的是斯大林逝世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苏联社会）。在作者笔下，茹拉甫辽夫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不关心工人的生活，一心只想怎样完成生产任务，得到上级的奖赏和表扬。他在向上级汇报时，报喜不报忧。他把建筑工人宿舍的专款用于造新车间，让工人长期住在破旧的工棚里，直至造成事故，于是他被撤职查办。但是，爱伦堡的真实意图显然不是仅仅描写这样一个官僚主义者，他是要通过这个人物，让读者去思考产生这种类型人物的社会原因。老布尔什维克、老教师普霍夫对这类人深恶痛绝，他深知这类人是有社会基础的：“茹拉甫辽夫是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有多少人因为这种人而痛苦流泪呀！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踢掉一个这样的人，马上还会冒出十个来，像雨后春笋……”小说结尾时，茹拉甫辽夫在降职改造中一旦站稳脚跟，又原形毕露，这说明在他的上下左右仍存在着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也许是这个结尾是《解冻》一直遭到苏联官方冷遇的原因之一吧！在苏联五十年代的作品中，爱伦堡的《解冻》是最早触及苏联社会重大问题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抓生产与关心人的关系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等等。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们期待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急切心情，他们渴求友谊和温暖，有冲破造成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障碍的热烈愿望。这也正是这部作品在苏联社会引起轰动，在读者中激起共鸣的主要原因。苏联文学批评界至今仍然认为这部作品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

另外，“解冻”的含义也包括艺术创作方面的“解冻”。在小说中，爱伦堡通过塑造沃洛佳和萨布罗夫这样两个画家的形象，他们不同的创作道路，来阐明他在艺术创作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的看法。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爱伦堡的艺术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正确地批判了以沃洛佳为代表的粗制滥造、看风使舵、追求金钱的庸俗倾向；另一方面他却又极力赞扬以萨布罗夫为代表的脱离生活、单纯追求艺术创作自由化的道路。这种片面性也正是苏联文学批评界批评爱伦堡的一个重要口实。

主要代表作品

《第二天》

三十年代是爱伦堡思想发生新的变化和创作丰收的时期。长篇小说《第二天》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爱伦堡正面地描写了苏联人民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和干劲，真实地揭示出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成长的过程，讴歌了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一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长篇小说《第二天》为我们展示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工业建设方面的广阔的生活画面。

这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刚刚开始建设的最艰难的一年。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还是一片荒野的建筑工地。这里只生活着为数不多靠打猎为生的肖列茨族人。他们常常离开自己的山村到原始森林里去猎熊，打水獭和松鼠。巫师敲着大鼓，用一种难懂的语言跟鬼怪谈着话。鬼怪们喜欢肉和毛皮。猎人唱着歌：“鸟呀！鸟呀！你可别啄我的死眼睛！”肖列茨女人露出长而下垂的乳房在给五岁的小孩喂奶。小孩像只小熊样地呼哧着。当人们把各种机器开到这儿来的时候，肖列茨人个个都惶恐不安起来。机器在草原里奔驰着，吼叫群，新来的人们开始砍伐森林。这时，肖列茨人都跑开了。他们从这个山村传到那个山村：“哥萨克来了！”他们把俄罗斯人称作“哥萨克”。巫师、小孩以及熊和水獭，都像躲避森林里发生的大火似地跑掉了。八月里，原始森林里常常起火，巫师说，这是鬼怪在发怒。

到这里来的有乌克兰人和鞑靼人，别尔米亚人和卡露茨人，布略特人，契米亚人，卡查赫人；有从尤卓夫卡来的矿工和高洛姆来的车工，有共青团员，有梁赞来的络腮胡须的筑路工；有被剥夺财产、判处强迫劳动的莫斯科市场上的投机商和盗用公款的罪犯，有热心工作的人，有骗子，有教徒。这个工地一共有二十二万人。人们搭起了工棚，全家老小都睡在一张小床上。他们在床的四周挂起破破烂烂的布片，希望在夜里避一下旁人的眼睛。西伯利亚的严冬快要到了。他们又匆匆忙忙地挖好了无数的小土窑。人们就像生活在战场上一样。他们在爆炸石头，采伐森林，站在深及腰部的冰中加固堤坝。

从外国来了一些专家。他们生活在这儿，就像是在北极或是撒哈拉大沙漠地带一样。他们对一切事物都表示惊奇：人们的热情，路上的坑坑洼洼，严寒。所有的外国人都说：要建设这样规模巨大的工厂，几个月是不行的，起码要好几年。莫斯科却说：工厂建成日期不能以年计算，而应当以月来计算。每天早晨，外国人都惊奇地皱着眉头：工厂在成长着。

第一号熔铁炉在四月四日提前开工生产了。天空染成了桔黄色，空气中充满了碎裂声和煤烟气味。工地主任向党中央拍发了简短的特急电报，工人和技术人员们在大俱乐部里庆祝胜利。在这天，二十二万个建筑工人都在微笑。建筑工柯里亚·尔扎诺夫也在微笑。他虽然很年轻，却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道路。

柯里亚的父亲死于白匪军枪下，母亲和两个兄妹也病死了。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孤身一人，提着一只小箱子来到了建筑工地，被派到熔铁炉车间。

柯里亚烦恼地打量了一下工棚。人们连鞋也不脱就躺在床上。屋子里充满了马合烟和汗臭，空气十分闷人。屋角里有个婴儿在哇哇地直哭。柯里亚

想看看书，可是灯光很暗，他的眼睛看一会儿就发痛了。他想：他干吗要上这儿来呢？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既清净又安宁，晚上他还可以看书。……难道在这种牛栏似的工棚里能生活吗？柯里亚看到墙报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进行伟大的建设！”他怀疑地冷笑了一下：他在周围所看到的都是些疲倦不堪和不幸的人们。

三天以后，柯里亚上俱乐部去了一趟。他在那儿遇见了瓦夏·斯莫林。斯莫林向他谈起共青团突击队的故事。柯里亚微笑了一下。不知他是为斯莫林的话而高兴呢，还是在嘲笑他。然后，他还是那样微笑着说：“我在配售商店发现糖果是发给突击队员的。这是怎么搞的；这儿是劳动热情，那儿就是一公斤糖果？……”斯莫林并未感到困窘，他说：“奖赏或是祝贺——这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建设，赴汤蹈火，不顾一切，人们不吃东西，不睡觉。连洗澡都没有时间。”柯里亚已经不笑了。他若有所思地用纸烟捣着烟盒，答道：“也许是这样吧。这种事我还没见过呢！”

柯里亚被编入了吉洪诺夫工作队。其他工作队的工人都在嘲笑他们，称他们为好吃懒做的“树懒”。这使柯里亚很生气。他用一种细微的、几乎不像自己的声音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小伙子们，我们哪儿比别人差？……”他一说出来，脸就羞得绯红。他以为小伙子们会嘲笑地回答道：“想吃糖果了吗？……”但是小伙子们没有吭声，不能再退却了，柯里亚踌躇了一会儿，就去钉车轮上的钢板。他一直工作到精疲力竭才放手。夜里，他好久没法入睡。耳朵里嗡嗡地响着；当他迷迷糊糊入睡时，常常抽筋似地打哆嗦，仿佛有谁惊醒了他的似的。

斗争就这样开始了。柯里亚既没有去想伟大的建设，也没有去想国家和革命；他一心只想着数字——赶上去！他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他逗着法捷耶夫：“会奖给你一双皮靴的！”他故意夸奖年轻的克留契诃夫：“你是我们队里最棒的！”他鼓励吉洪诺夫说：“一定会提拔你的。”他自己却什么也不要——既不要皮靴和表扬，也不要上什么干部培训班。他只要赶过这帮无礼的家伙。

在第三旬内，吉洪诺夫工作队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零九。只有波格丹诺夫工作队还超过他们。七月里，吉洪诺夫病倒了。大家选柯里亚为队长。法捷耶夫递给他一瓶酒，表示祝贺。要赶过波格丹诺夫工作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柯里亚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九月里，他的工作队得了第一名。看来，他应该感到幸福。可他突然发愁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呢？……好几天来，他一直沉默不语，感到闷闷不乐。索洛维耶夫问他：“八号热风炉我们什么时候能完工？”柯里亚突然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的生命现在已经跟这些巨大而粗笨的怪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自尊心、数字、奖励牌，也忘记了那个又设法赶过了他们的波格丹诺夫工作队。他只为热风炉而工作。他看见它们在成长，于是他怀着孕妇似的激动、幻想和担忧的心情注视着它们隐约的成长。

正月里，严寒刺骨。寒暑表上标着零下五十度。就是老西伯利亚人也感到有些畏缩。在一个最寒冷的日子里，柯里亚站在热风炉旁。他发现支架上的钢绳给绞住了：钢板没法拉上去。这时，柯里亚便毫无顾虑地爬上去，上面更冷。柯里亚困难地呼吸着，眼前浮现出一个一个巨大的光圈。他觉得自己正在往下落。但是他并不害怕，因为在这一刹那间，他并未想到死。他的身体突然失去了平衡，但很快就抓住了钢绳。在他面前呈现出整个工地的景象：

热风炉，马丁炉上细小的烟囱，长长的初轧车间，挖掘机，起重机，绞车，桥梁。所有这一切都在这寒冷的、仿佛是人造成的天地里抖动，到处是烟囱和机器，空间仿佛不存在了。在工地的上空悬吊着一个细小的人。他要把钢绳拉直，终于达到目的，拉直了。

他在上面呆了一个多钟头。一下来之后，他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人们都围在四周。有人叫道：“抛他一下！”大伙把他往上抛了好几次。他没有作声。沙木什金为了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骂了一声，然后紧紧地握了握柯里亚的手。索洛维耶夫也嘟哝着：“不错，老弟，真是英雄！”柯里亚没有微笑，他向上面望着——现在都弄好了！

当柯里亚爬到热风炉上去整理钢绳时，肖尔到车间里来了。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向柯里亚道贺的。可是，肖尔却吼道：“怎么这样傻？你会冻坏的，要不就会摔下来！难道咱们这样的工人太多了吗？见鬼，要保护自己！”他边说边笑。他看见了柯里亚那双充满了困惑和快乐神情的眼睛。肖尔从来没有过孩子。当他到那些有家眷的同志们那儿去时，他常常跟孩子们一块儿在地板上爬着，并且可笑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现在他就像看自己的儿子那样看着柯里亚。他又骄傲，又感动。然后他向管理局跑去，把柯里亚忘记了。

柯里亚没有忘掉肖尔。他说：“真是个好老头儿！”肖尔才四十七岁，但他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者。每当柯里亚想到肖尔领导着这么大的一个重要建筑工地时，心里便充满了无限的敬意。每当他心中充满疑虑时，每当他看见周围的人有自私和胆怯的现象时，他就想起了这位过早衰老的“老头儿”。这时，工作起来就有劲了，柯里亚又快乐起来。

肖尔的一生是伟大而朴实的。他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斯摩棱斯克事件而坐过牢。他从监狱里逃跑，来到了巴黎。他恶意地斜视着豪华的商店、咖啡馆的灯火，因为这时他想起了那些秘密接头地点、会议和弥漫着马合烟和汗味的宿舍——他很想念这一切。他把薄薄的传单贴到硬纸板上，党报就这样送到俄国去了。他拿着小扶梯和拎桶走来走去给人家擦洗玻璃，他就依靠这种方法来挣点钱。然后，他咬着烤过的土豆，用手帕擦一擦眼镜就坐下来看书。有一次他偶然得到了莫泊桑的一本书，一口气就读完了它。他惊奇地感到他的喉头哽住了！他真想哭出来。以后，他又把自己骂了一顿：难道能把时间花到这上面去吗？他又开始去看恩格斯的著作了。

回国后，他参加了彼得堡地下党组织。他到处演讲：在马戏院和兵营里，在货车上和皇帝的墓碑座上。他跟士兵们一起攻打冬宫。他也曾在前线跟白匪作战。革命胜利后，他参加过农业集体化运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开始，他就自动要求到僻远寒冷的库兹涅茨克。他说：“真是伟大的事业！”他对谁也没说，正是这项事业存在困难，所以吸引着他。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仿佛像一张履历表。但是，在那钢铁般的、严峻的生活后面，还有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有点驼背，眼睛近视。

当他刚到库兹涅茨克的时候，他对冶金学一窍不通。这是他又一次从事新的工作。从前，他刻苦学会了政治经济学及各种数字。后来，他弄懂了国际政策和监狱中的暗号——他常常跟他隔墙的犯人互相敲着墙壁。他学会了用步枪射击和讲幽默笑话。他研究过战略，也能识别哪一种木材适于造船。后来，他到农村去了，起初他不能区别小麦和燕麦。可是一个月之后农民们都对他说：“要小心那个戴眼镜的，这个人可机灵呢……”

他又到工地上来了。他想得马上弄懂：什么是大钢坯、风嘴、动臂起重

机、抓斗和气体洗涤器。他开始新的工作了，把粮食、木材、战略等都忘记了。他觉得，这一生中他干的就是建设工厂。他现在能丝毫不差地说出：工人们一天能砌多少块砖，铆接工作何时完工，应该如何为抽水管挖土和怎样钉螺栓。

有一天，沙洛夫工程师问肖尔：“您看过《水力发电站》这本小说没有？您知道，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肖尔不好意思，脸都涨红了：“不知怎么搞的，就是没有时间。总之是自己太荒唐了。谢谢您的开导。现在我一定要看它一遍。”

他真的拿起书看起来了。可是他突然记起耐火砖车间的小伙子们吵吵闹闹地要皮靴，于是他就奔往电话那里拿起听筒：“难道不能搞些皮靴来吗？真是岂有此理！……”就这样他没法把小说看完。

有一次，他碰见一位英国著名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问肖尔：“你们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怎么能工作呢？我在某本书里看到，在俄国，专家们很少有浴室，汽车是更不用谈了。也许你能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专家能拿多少钱？”肖尔看了这英国人一眼，他的眼里闪着愉快的神情。他回答说：“我拿的钱，跟党的工作人员比较起来，是最高的一级。少得可怜！比看门人还少。我也可以说挣得很多。但是依我看来，实事求是要好得多。比如说，我就没有汽车。有时我就得等半小时电车，等不及就双脚走。洗澡得上公共澡堂，这就得花两小时。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你问我挣多少钱，我满可以回答你：多少多少卢布。但折成英镑就要困难得多。但问题不在于此……我能够得到愉快。您认为，真正的愉快能值多少钱呢？就用英镑来计算吧！……”英国人有礼貌地微笑了一下。

现在，柯里亚工作队出了问题：绞车闸轮被盗。大家都怀疑是富农出身的共青团员瓦夏偷的。柯里亚认为不是瓦夏干的，因为他是个优秀的共青团员。他去市委开会时，跟一位负责人马尔古托夫谈了他的看法。但是马尔古托夫固执地认为，像瓦夏这样的人肯定是钻进党内、共青团内的坏分子。柯里亚感到茫无所措。他想起了“老头儿”。肖尔什么都懂。他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此外，他有一双善良的眼睛。他连骂人都像是在开玩笑。不妨去试试看！

就这样，柯里亚到肖尔的房间来了。当柯里亚讲完时，肖尔嘟哝着说：“你明天让他来一下。我跟他谈谈。”

第二天早晨，当瓦夏上他这儿来的时候，肖尔迎面就吼道：“好啊！哼，你这个富农的儿子！这儿没有你的事。人们在建设工厂，可是你是干另一行的角色。你应当上苏哈列夫卡去，像你这样的人在那儿才可以自由自在呢。噢，你干吗张着嘴巴？这儿谁也不留你。你马上就可以滚到那些妖魔鬼怪那儿去。”

瓦夏呆呆地站着。肖尔很响地擤了擤鼻涕，问道：“有路费吗？”瓦夏没有回答。这时，肖尔走到他身旁，摘下眼镜。他的眼睛立刻就变得那么温和而又善良了。他说：“唔，你还要什么呢？”这时，瓦夏受了肖尔的声音和那双眼睛的鼓励，开始说话了。他讲了很久，前后都不相连贯。他发誓，绞车闸轮不是他拉掉的，更不是他偷的。他说，他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要在工地上工作。他不是叛徒，而是个忠诚的共青团员。肖尔沉默着。瓦夏也不说话了。然后，他笨拙地噘起下嘴唇，说道：“没有党我就像没有了家。”

瓦夏的话使肖尔大为感动。他明白，这个小伙子讲到党时，就像肖尔自

己对党的看法一样，对他来说，党不光是国家，不光是策略和建设，而是一种非常亲切的东西，离开党，就等于离开了生活。肖尔想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又擤了擤鼻涕，接着他嘀咕了一声：“好小子！”然后，他打了个电话给马尔古托夫：“我把瓦夏留在我这边，搞抽水管工作。”他又转身严厉地对瓦夏说：“可是，小兄弟，你在我这儿得注意一些！我可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他紧紧地握了握瓦夏的手。

当瓦夏给柯里亚讲起他跟肖尔谈话的情形时，柯里亚十分高兴。他之所以高兴，不只是因为救了一个同志，而且也觉得生活更加明朗了。他看到，除了书本和言语外，还有眼睛：眼睛也能说话。他感到更加有力量了，仿佛他获得了理解别人心情的权利。

他对瓦夏说：“过去我觉得生活非常枯燥无味。现在，我已用另一种眼光来看生活了，做一个真正的人多有意思，像‘老头儿’那样。他真是什么都知道：又是抽水管，又是挖隧道。看见他桌子上放着那么多图纸，仿佛一世也学不完似的。此外，还有一点，他是个人。瓦夏，我想，到共产主义时期，所有的人都会这样的。”他微笑了一下，并且开玩笑地加上一句：“只是年轻一些，没有戴眼镜罢了。”

柯里亚的生活刚刚开始。他觉察到同志们对他信任的眼光，他开始相信自己了。他走路的样子也变得活泼而稳重了，眼神似乎深沉了，声音也变粗了。从前，他觉得他什么也不能干：不会工作，不会学习，也不会恋爱。现在，他经常感到，他的身体内部在活动，在成长。有时，他一面工作，一而就“呵”地叫一声，这只是为了要听听自己的声音。当他从黑暗的工棚里走出来的时候，不仅内心感到高兴，他的眼睛也显出高兴的样子，瞳孔眯了起来，愉快地环顾着整个世界——巨大的烟囱，耀眼的白雪，细小得如甲虫般的人群和那冬天的黄澄澄的太阳。他知道他很健壮，能够毫不费力地搬起一根笨重的铁柱，那双脚能够灵巧地缠住钢绳。他觉得自己内心十分愉快，而且不再跟同志们格格不入了。在白天工作完毕后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也闹着，笑着，跟大家一块儿唱着爱情小调儿。

有一天晚上，柯里亚在斯莫林那儿看见一本书，里面尽是各种起重机的插图。他把这本书看了几个晚上，终于弄通了起重机的工作原理。他高兴地微笑了一下——这多简单呀！他开始去研究其他机器构造原理。他内心蕴藏着的巨大好奇心觉醒了。他知道自己知识非常缺乏。他想一下子弄懂所有的东西。这种感觉就像饥饿那样敏锐和折磨人。每晚，他总要从图书馆借回一本新书。现在他每晚都要看书，睡不到四五个小时。他看完一本又借一本：从彼得大帝到解剖详图，从挪威航海家南生的游记到政治经济学。他在俱乐部里向那些高明的同志们请教许多问题，如：日本农民的处境怎样，别洛夫斯克工厂马弗炉的工作情况怎样，什么叫壁画，圣西门写过些什么书。他热烈地谈着同温层里的飞行和彩色电影。他在自己面前看见了数千个门。他徘徊着，不知道首先应该进哪个门。他并不想成为一个化学家或者工程师。他只是生活着，并且想了解这种生活。他觉得，他能够搞懂所有的东西。

他继续以那种顽强的热情在工地上工作。但是，他的视野扩大了。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热风炉和熔铁炉对他说来就像些小树丛。他知道，需要修建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炉。他知道，通向幸福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是道路的漫长并没有使他气馁。他反而很高兴这一点。他明白建设不会停止。他只是刚刚揭开这本吸引人的“书”，而且非常高兴这本“书”有这么多的页数，

要读完它是不容易的。现在，他老是想寻找幽静的地方，但是，并不觉得自己孤独。他发觉同志们也跟他一样都坐在工棚的角落里，拿着一本破旧的书在看。这种“狂热病”也震动了其他人。这不是什么稀有的病，这是一种流行病。人们就是这样建设着工厂，也这样改造着人的本身。

但是，在革命建设中总有一些人跟时代格格不入。在托姆斯克学习的大学生沃洛加·萨风诺夫就是这样的人。萨风诺夫出身于破落的公爵之家。他父亲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医生，曾因诊断错误，把一个寡妇医死了。沙皇倒台以后，他的父亲带着一种笨拙和抱歉的笑容迎接了革命。有一次，他因为不让公安人员进病房搜捕一个患病的反革命分子而被抓到监狱关了五周。不久死去了。父亲遗留给萨风诺夫一顶皮帽，但他却常常回忆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唉，沃洛加，还不是换汤不换药！……”

萨风诺夫当时只有十一岁。他被姑母领去了。姑夫是个兽医，在十月革命以后很快就钻进了党。他还作过一次通俗演讲：《在消灭家畜流行病斗争中的阶级立场问题》。在家里，这位兽医松松腰带，狡猾地眯起眼睛，嘟哝道：“跟狼在一起——你就要学狼叫。这是最正确的方法。”

中学毕业以后，萨风诺夫想进大学。但是，他父亲曾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处监禁。这一条就使他无权进一步深造。他的表兄给他出主意说：“在车床旁呆上两年。在工厂里工作一个时期，一切大门就会对你敞开的。”

萨风诺夫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流浪之后，在契里亚宾斯克定居下来。他在那儿当了磨床工。他工作得很好，但是没有热情。他对同志们很和气，谁也不触犯，什么也不埋怨。当他有钱的时候，他就请同志们喝啤酒。同志们欢笑着或是唱着歌，而他却默默地微笑着。大家这样谈论着他：“小伙子倒不错，就是不喜欢说话。”谁也不知道，他在车床上工作，或者晚上回到那狭窄的寝室里时，在想些什么。

萨风诺夫还过着另一种隐秘的生活。无论是机器的轰闹或是同志们的嘲弄都不能窒息它。他总是看书。当他那双疲倦的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闷热而寂静的黑夜里沉思着。他的思想就像害狂热病的人那样激动。有一次，他的同志恰德洛夫问他：“萨风诺夫，你为什么不加入共青团呢？”恰德洛夫知道萨风诺夫想升大学。这个幻想恰德洛夫是能理解的：他本人也参加了速成学习班。他觉得萨风诺夫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一点他不能理解：萨风诺夫为什么不是共青团员。萨风诺夫没有立刻回答他。他的眼睛望着旁边。他早就学会了沉默，但是还不习惯于装假。他回答恰德洛夫道：“你晓得，首先，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同……”恰德洛夫大笑起来：“别装蒜了，你以为摆脱了社会活动会提高得快些。依我看，时间是足够的。自然，非党非团群众也可以工作，甚至还可以成为先进工作者……”萨风诺夫没有反驳；他认为最好是不说话。但是在他回到家里之后，却没有心思去看书。他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了他这时的思想：“恰德洛夫不相信我。他们不容许与他们思想不同的人存在。……父亲说：‘还是换汤不换药。’可是，对什么事情去耍滑头呢？存在着两个真理。一个是暂时的，这个真理在他们那边；另一个是永恒的，这个真理谁也没有掌握。时间和空间都改变不了它。对于这种真理的存在，只能根据矛盾的总和来加以推测。至于说到我，除了作些庸俗的比喻和背后嘲弄之外，什么也没有。”

萨风诺夫的幻想比他所期望的时间提前实现了。他考取了托姆斯克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个年轻姑娘伊林娜。他们每天晚上都会面。他们谈

论着诗，春天，生活。他们从不谈爱情。伊林娜觉得跟萨风诺夫在一起很快乐，只有一点使她百思不解：他对一切都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他觉得，他和伊林娜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伊林娜对生活充满了幻想和热情，而他却感到孤独和毫无意义。他终于下定决心跟她断绝了关系。伊林娜的感情受到了打击。她决定离开托姆斯克，到一个工地去教书。临行前，她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长信，谈到她对萨风诺夫的一片深情，谈到她对生活的看法，并规劝他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力量，寻找幸福，不要总是躲在个人的小天地里，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这封信没有写完，她也没有寄出去。

不久，伊林娜去听扎里雅洛夫教授关于《黑色冶金学发展远景》的报告，会后，她与柯里亚邂逅相遇。柯里亚告诉她，他在库兹涅茨克工作。上这儿来只呆十来天——开党会。他谈起库兹涅茨克有许多出色的熔铁炉，谈到他的工作。他很兴奋，因为，在这温暖的夜晚，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听他讲话并且能理解他的人。伊林娜惊奇地听着柯里亚讲述的一切，她觉得他所谈的东西很吸引人，甚至她也想亲自去看一看这种不平凡的生活。

几天过去了。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有一天晚上他们从电影院出来，柯里亚涨红了脸说道：“我就要走了。你怎么样，到库兹涅茨克来吗？”伊林娜觉得，这个人对她有一种不可理解的魅力。但她又不能完全忘掉萨风诺夫。所以，尽管她内心很高兴，表面上却显得冷淡地回答说：“我一定来。来工作。”她把后面两个字的语气说得重一些，为的是不要让柯里亚以为她的打算是对她所爱的那个人的背信。但是柯里亚并不知道那个人。伊林娜坦率地向他讲述了她对萨风诺夫的一片真情。柯里亚感到意外，他的眼神变得阴暗了，浑身发冷，缩着身子，但他还是十分礼貌地说道：“再见吧。在工地上见。”

自从跟伊林娜断绝关系以后，萨风诺夫没有说过一句有生气的话。沉默使他非常害怕，他有时一面自言自语，一面斜眼看着附近是否有人，——他觉得自己快疯了。一星期以前，他在食堂里看见一张有关召开大学生讨论“文化建设”会议的布告。他决定到会上去发言。他拿出日记本，想写一个发言稿。他用尖刻的语言嘲笑人们愚昧无知，只知道熔铁炉，根本不配来谈文化。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恶毒的比喻。他最后决定不写发言稿，凭感情即兴发言。

萨风诺夫走上讲台时，才恍然大悟，不知道要讲些什么。他沉默了片刻，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应该学会做一个勇敢的人。问题不在于我，问题在于我们。我坚定地說出‘我们’这个字。‘我们’就意味着反对他们。“我们应该获得胜利。我们应该从那儿取得最宝贵的东西。这不是战利品，而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血液。文化不是地租，不能把它藏在柜子里。文化在一刻不停地产生着——每一个字，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行动都能产生文化。我在这儿听到你们谈音乐、诗歌。这就是文化的诞生、成长，痛苦而艰难的成长。你们看一看，在西方有些什么东西——这一点我今天才明白。只不过是几个博物馆和几个孤零零的怪物。这是死亡。至于生活，生活就在这儿……”

萨风诺夫讲完后，大家都跑过来向他祝贺。在他离开会场走近门口时遇见了伊林娜。伊林娜轻声地说道：“我多么替你高兴呀……”

他痛苦地皱着眉头，气冲冲地回答伊林娜说：“老实说，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我只不过是耍一下两面手腕，跟大家一样。我有两种生活：想的是一种，讲的又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跟你说我是英雄。你甚至可以说我是胆小

鬼，我不会生气的。只是请你不要把我和你说的那位诗人谢尼亚混为一谈！”

伊林娜浑身都冷了。她觉得，他讲这些话是想气她。她难过地想道：“他把我恨到什么程度了呀！”她试着微笑了一下，但笑容却是负疚的样子：“别了，萨风诺夫！我后天就上库兹涅茨克去。”他突然站住了，凝神地看了她一眼，轻轻说道：“愿你在那儿幸福！”他这句话说得这样沉痛，以至他自己也感到惊讶起来。伊林娜叫道：“萨风诺夫，等一等！……”但是，他跑掉了。

伊林娜来到库兹涅茨克的一所学校当教员。她和柯里亚真诚地相爱起来。可就在这时，萨风诺夫又突然闯进了他们之间。

那是在一天深夜里，在下工回家的路上，萨风诺夫看见了伊林娜。萨风诺夫从黑色冶金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库兹涅茨克工地当工程师。他一直在想念伊林娜。他看见，她跟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起站在小桥旁。他走过去，甚至听见了他们的悄声细语：“那么，明天……”他们没有发现他。萨风诺夫立刻明白了，他来晚了。这简单得跟租间房子或买双套鞋一样，他的位置被别人占去了。他像梦游者似地跟在伊林娜后面。在伊林娜看见他叫了一声之后，他像当场被发觉的小偷一样跑开了。

下雪了。冬天降临大地。伊林娜还是在学校里工作。她的工作很多。柯里亚参加了夜校。他们的会见是短促而紧张的，在这短短的一小时内要谈多少东西呀！不过，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相信，这就是柯里亚看过司汤达的作品后谈到的“平凡的爱情”。

而萨风诺夫却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他几次三番想要把怀念伊林娜的思绪赶跑，可是，他怎么也忘不掉过去和伊林娜相处的日子。所以，有一天他在桥边遇上托里亚去买伏特加酒，他便跟他一起进了酒馆。

托里亚是个技术熟练的钳工，但他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拜金主义者。他是受着金钱的引诱才到工地上来的。他每月能挣五百卢布，有时甚至六百卢布。他说：“我工作就是为了钱，就像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一样。”他爱上了格鲁妮亚。格鲁妮亚是从农村来的青年女工，共青团员。她坚定而热情地信仰共产主义。因此，她听了托里亚讥笑共青团的那番话，感到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她对托里亚说：“如果你这样来谈论共青团，那我就不是你的同志。我要嫁给一个诚实人，而不嫁给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从此，他们的关系破裂了。从这天起，托里亚变得更坏了。他开始酗酒，接连几天不上工。他之所以没有被开除，是因为他是一个熟练工人，而当时钳工很缺少。自从认识了萨风诺夫以后，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喝酒，发牢骚。这一天，他们各自怀着失恋的惆怅心情，在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话语间，萨风诺夫向托里亚暗示，只要把机器上的杠杆往另一个方向一扳，机器就毁坏了。托里亚听了满脸发出了光彩，好像什么东西照亮了他。他走到萨风诺夫跟前，把嘴唇凑到他的耳朵旁，悄悄地说：“你说得对——往另一个方向一扳！可是，你可不要作声！……”萨风诺夫打了一个寒噤，感到事情不妙，拔腿跑掉了。

醉意消散以后，托里亚想起了萨风诺夫的话。他踉踉跄跄地来到工地上，向四周看了一下，周围没有一个人。他悄悄地走近机器，他把杠杆当成一个人，向它扑过去。在这一瞬间，他觉得杠杆变成了活人——格鲁妮亚，柯里亚，共青团员们。杠杆不肯屈服，托里亚的额上暴起了青筋。他忘记了自己，一使劲，杠杆终于让步了。这时托里亚高兴地冷笑了一下：现在他跟生活算了帐。他正想逃跑，有人抓住了他的肩膀。这人是富农的儿子马洛佐夫。工

人们跑来了，带走了托里亚。托里亚没有说出萨风诺夫，他被判处五年徒刑。

萨风诺夫怀着恐惧和厌恶的心情离开了库兹涅茨克，他感到绝望。他心想：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一切……

春夜里，冰块发出了碎裂声。汹涌澎湃的河水在山谷间奔流。建筑工人们在大森林边缘集会，庆祝“五一”劳动节。柯里亚瞧了瞧树木，初生的嫩草，长满了绿芽的灌木。“见鬼，又是春天了！……”最近几星期来，他一直在不停地工作着。现在他第一次向春天微笑了。

《第二天》是一部描写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工业建设的长篇小说。大家知道，苏联国内由于内战的破坏，面临着穷蹙不堪的经济局面。经过几年的恢复，从一九二九年便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作家爱伦堡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描写工业建设的本身，而是表现苏联一代新人在精神上的成长，新的道德品质的形成。

柯里亚·尔扎诺夫的成长过程具有典型意义。柯里亚原本是一个糊涂虫。他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具体的爱好。中学毕业后，他不知道他应该怎样生活。

可是，自从他来到西伯利亚的冶金工业基地的建筑工地以后，他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最初，他发奋工作只是为了争气，不愿让人们嘲笑他们的工作队。渐渐地，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他懂得了，他是生活的主人，他是在为缔造自己祖国的美好未来而工作。他成了突击手，当上了工作队长，受到同志们的信任。他也开始相信自己了。在工作中，他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于是，他又开始发奋地读书。他感到，在他面前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世界。为了保证热风炉按时开工，他可以不顾一切地爬到几十米高空上去整理钢绳；为了堵住河水冲开的堤坝的缺口，他可以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跳进布满碎冰的河水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可以日以继夜地翻阅各种技术书籍，绘制出动臂起重机图纸……

柯里亚是一个优秀的共青团员。他的成长显示了党的领导和教育的巨大力量。小说塑造了肖尔这个党的工作者的形象。肖尔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有着光荣的过去。但他不吃老本，仍然忘我地工作着。他关心工人，大公无私，热爱生活。他总是生活在群众之中。在肖尔的教育和影响下，柯里亚成了一名出色的工人。最后，党组织决定让他到中等技术学校去进一步深造，把他培养成第一代工人工程师。

柯里亚是千千万万苏联青年中的普通一员，因而，他的成长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爱伦堡成功地塑造了以柯里亚为代表的苏联一代新人的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苏联普通青年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

与柯里亚的形象相对照，爱伦堡还塑造了一个思想反动的青年典型——萨风诺夫。他出身于破落的贵族之家，父亲曾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党和人民让他进了大学，当了工程师。他本可以背叛自己的阶级，另外选择一条革命的道路。可是，他不肯投身于生活的激流中去，总是躲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唉声叹气，用仇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因此，在集体中，他总是与大家格格不入，患得患失，自始至终坚持他的错误立场。尽管他也学会了变色龙和两面派的本领，但最后也只能落得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可悲下场。萨风诺夫这个形象告诉人们，一个青年只有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不断磨炼自己，提高自己，才能逐步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能成为一代新人。

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如伊林娜、格鲁妮亚等，虽然着墨不多，但形象是鲜

明的。她们是新一代的妇女典型。她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工作的火一般热情，对爱情的水晶般的纯真，对一切坏人坏事疾恶如仇……这一切优秀品质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在掩卷时也仿佛感到历历在目。

爱伦堡由于长期从事记者工作，这使他养成了思想敏捷，反映迅速，见闻广博的特点。这种特点也明显地表现在《第二天》这部长篇小说中。表面看来，小说结构有些松散，作家的笔忽东忽西，而在读完全书，纵观全局，并仔细思索之后，就会发现：作家的意图正是要在这种广阔的生活和建设的背景上，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人物之间的相互纠葛中，表现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现出人物的思想发展历程和他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

《巴黎的陷落》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这一天，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曾经是大革命的摇篮和策源地的巴黎，现在在德国法西斯的面前屈膝了。爱伦堡当时正在巴黎。他是法兰西悲剧的目击者。他熟悉法国人民在战争前夕所过的那许多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而现在他又亲眼看到了巴黎陷落后的种种可怕的景象。当年八月，爱伦堡返回苏联。他先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法国沦陷的通讯和报告文学，接着，用了一年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这部报告文学体的长篇小说，真实地揭示了法兰西民族悲剧的前因后果。

《巴黎的陷落》全书共三部，描写了欧洲和法国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一年巴黎陷落前后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一九三五年法国人民阵线的诞生；一九三六年西班牙人民军队的短暂的胜利和它的惨败；战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的上空，许多国家的领土践踏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接着，在一九三八年慕尼黑会议之后，德国法西斯很快占领波兰，随后便长驱直入法国的疆土。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巴黎终于陷落了。小说就写到这个划时代的日子为止。爱伦堡像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为我们展现了现代历史上这幕划时代的悲剧。爱伦堡又像是一位气魄宏大的画家，用他的彩笔为我们描绘了欧洲现代生活，特别是法国现代生活的真实而广阔的历史画卷。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的巴黎。

画家安特莱的画室在晌午路。这是一条古老的街道，两边都是些被烟熏黑了的房屋，在房屋的墙壁上，百叶窗的窗格留下了一条条的黑印子。这里有许多卖古董的店铺，从早到晚，人群川流不息，喧嚣不止。

安特莱的画室在顶高一层楼上，十分安静。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屋脊，由砖瓦形成的一片海洋，波涛起伏。轻烟从屋脊上升起；在远处，淡橙色的光辉中，耸立着埃菲尔铁塔。

这是巴黎的一个变幻不已的早春的下午。安特莱正在画一束紫菀花，听到门铃响了，原来是他的老朋友比埃尔来访。比埃尔是赛纳飞机制造工厂的工程师，性情活泼好动，容易激动，但意志薄弱。他曾经参加过协和广场上的暴动事件，出席过反法西斯的群众集会。他每天读十份报纸，每有示威游行，决不缺席。

比埃尔和安特莱是大学时的同学、好朋友。每次他们见面，比埃尔总要把他最近耳闻目睹的新闻告诉他的朋友；新发明的发动机，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反法西斯作家大会，新成立的“人民阵线”联盟……。安特莱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微笑地听着。然后他们到咖啡店去喝点啤酒或威姆酒，就分开了。这一分手可能就是一年，等到比埃尔又记起他的朋友的时候，他又会兴冲冲地闯进安特莱的画室，喊道：“我要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你……”仿佛他们前天曾见过面似的。这回也是如此。

比埃尔告诉安特莱说，社会主义者维拉尔发表了演说，谈到即使德国还是军国主义，也必须实行普遍裁军，这样就不会有任何战争了。接着，比埃尔生拉硬扯地把安特莱拖到了文化大楼的群众集会上。

安特莱从没有参加过政治集会。他惊奇地发现，在台上讲演的那个人原来是他们中学的同学吕西央。吕西央是国会议员戴沙的儿子。此刻，他谈到了希特勒、战争和革命。吕西央的话音刚落，一个青年人便冲上讲台，揭露吕西央的父亲在一个大规模的舞弊案件中捞到了八万法郎。台下一片混乱。

安特莱受不了这种情景的刺激，一口气跑了出来。比埃尔和吕西央从后面追上来，邀他一起去咖啡店喝啤酒。随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吕西央的情妇让妮特，一个电台的女演员。他们又谈起了法国的政治形势。安特莱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站起来说：“战争决不会有。可是我要走了。吕西央，你不要不高兴。我是这种爱自己的小巢的人，像一只猫；我不喜欢开会，不喜欢……”他摇了摇手便离去了。随后，比埃尔也告辞了。

比埃尔离开吕西央之后便径直来到倍尔维尔路。这里住着他的女友安妮丝，一个小学教员。安妮丝显得神情忧郁。比埃尔谈起吕西央的演说，他们父子间的矛盾和宣传的重要，可是安妮丝却说：“政治是卑鄙的。这全是一套把戏。人民却依旧挨饿。”接着，她说她已经被学开除了。她打算去缝纱厂做工。比埃尔决定去找工厂老板德赛尔，请他帮忙。

德赛尔是一个五十岁左右，颇为自负的人，浓密的睫毛下，一双锐利的眼睛。他是法国一个有实力的资本家巨头。他绝对不允许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走近他的身旁，他顽固地拒绝发表任何政治演说，尽管没有一个内阁不经他同意是能站得住的，但他否认他能影响国家大事。德赛尔宁肯站在幕后，口授法律，指导外交政策，挑选部长，还颠覆他们。但他不愿意给人知道他的威力。他喜欢冒险，因此他崇拜法西斯哲学。为了颠覆内阁，他付给法西斯秘密组织“火十字团”首领勃莱推依好大数目的一笔钱。达到了目的之后，他平静地告诉他的朋友勃莱推依：“从此刻起，最好你忘了我的地址吧。”现在德赛尔又左倾了，这成了国会客厅里人们经常谈起的一大新闻。人们甚至说他和社会主义者维拉尔勾结在一起了。

德赛尔住在巴黎附近一座小庄园里。他总是起早下厨房，用一杯白干，一只蕃茄，一片干酪当作他的早餐。读完早报，他便动身去巴黎。一路上他会对小学生和狗微笑，可是各种投资和产业数字很快占满了他的脑子。在办公室里，他读早上的信件、邮件和国内外的急电。到了十点钟，他才开始接见各部部长、外交家和金融家。

那天早上，比埃尔来到的时候，有两个银行家和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参事正等待接见。德赛尔首先接见了比埃尔。他和善地迎接了比埃尔。比埃尔婉转地述说了教育部如何解雇了安妮丝。德赛尔马上打电话给议员戴沙，请他转告教育部长恢复安妮丝的工作，并邀戴沙一起来吃午饭。比埃尔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

戴沙是急进党的代表人物，五十八岁，面孔削瘦而苍白，突起的颧骨，尖尖的鼻子，表面看像一个病人或是修道隐士，而事实上，他精力充沛，声音宏亮，是当时法国公认的最出色的演说家。戴沙认识“全巴黎”。他和几千人用“你”的昵称。他款待大使和检察长，给报界行贿，选民的要求他心甘情愿地做到，为一个当地的财务督察请了勋章，为一个勇敢的宪兵的寡妻请了一张烟草承销商的执照，或者为一个失策的暴徒请求停止起诉。

此刻，在酒席桌上，德赛尔要求戴沙公开宣布支持“人民阵线”。戴沙起初不肯，认为这是背叛。德赛尔耐心开导他，告诉他这是策略，现在“人民阵线”很得人心，必须打进去。德赛尔谈到，必须向德国让步，宁肯牺牲捷克和波兰，这样才能保住法国的和平。当德赛尔表示他愿意承担戴沙竞选的一切费用的时候，戴沙的长脸变得容光焕发了。

午餐之后，德赛尔又召见了一家大报《新道路报》的发行人兼主编姚利欧，指示他的报纸必须大造舆论，支持“人民阵线”。他说，维拉尔在反对

党里危险性很大，他咆哮起来很像一头狮子。可是给他一个部长的位置，他立刻就会像绵羊一样咩了。姚利欧心领神会，他喊道：“这一点无可置疑了，你是一个天才！天晓得结局是什么，可是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非常吸引我。把刀枪铸为犁锄……”

德赛尔满意地笑了并付给姚利欧一张巨额法郎的支票。

姚利欧急匆匆跑回他的报馆，大声发布他的命令：“找几个有名的左翼作家来！报上要登一幅墨索里尼的漫画！关于工人的凄惨故事！战争回忆——凡尔登的恐怖……”

晚上，他回到家，叫醒他的老婆，耳语道：“十万法郎！我的天啊，交了什么运了！”突然，他又带着一种悲哀的声调说：“可是法兰西从此完了！”

“人民阵线”、“法西斯”、“法律和秩序”、“战争”、“和平”、“革命”——这些字眼在巴黎上空回响着。德赛尔在街头漫步，看到一家亭子上张贴着一份报纸，上面的大标题写着：“人民阵线之要求……武装冲突危机……”他知道，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他——房屋的地产，摩托车，报纸，甚至那些笑容——都属于他所有。眼下正赶上国会大选，他要保住自己的王国，就得为竞选的事操心了。他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戴沙选进内阁。

和戴沙争夺议员位置的有三个候选人。有两个是四年以前已经选过一次的：共产党的狄第尔和城里的保守党的贵族及自称“国民派”的僧侣们推举出来的退伍将军格朗美松。再就是一个新的竞争人物杜嘉尔，他是一个和“火十字团”有关系的年轻农业家，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和影响。

在第一次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得到绝对多数的选票。下星期还得重选一次。和上一次相比，戴沙少了三千票。格的美松的票也减少了。共产党的票数增多了。现在杜嘉尔是领先的。

人们开始揣测：如果退伍将军放弃了候选，把票数都送给“火十字团”，杜嘉尔就有胜利的希望了。狄第尔会不会退出，把票数送给戴沙呢？中庸派究竟选谁呢？人们坐在咖啡店里议论纷纷。

一天晚上，急进派开会，并邀请了共产党的代表。戴沙慷慨激昂地表示，他要当一名人民阵线的议员。共产党代表狄第尔听了很受感动。他提出，为了阻止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了挽救处于国难之中的法兰西，他们决定选戴沙。戴沙站了起来，演员一样地鞠了一躬。共产党已决心选举他了。无疑地，这是一个成功。可是杜嘉尔还是要多出二三百票呢。戴沙不等大会结束，便忧心忡忡地回到了他的旅店。

就在这天晚上，“火十字团”头子勃莱推依找上门来了。勃莱推依的外表是一个老年的体育家的样子。人们对他都有一点惧怕。不论何时何地，共产党一上台演讲，他扭头就走。他说他不愿意听这些人讲话。他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常常领导那些青年进行军事训练。

勃莱推依开诚布公地对戴沙说，他愿意戴沙当选。因为戴沙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和出色的演说家，而且他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人民阵线。勃莱推依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戴沙因此而赢得了人心。他告诉戴沙，他要劝说杜嘉尔和格朗美松退出竞选，这样，他的选票就会大大增多。

戴沙终于当选了。戴沙决定把他的一切成功告诉家里人。可是有谁去听他呢？儿子吕西央离开他到西班牙大使馆当外交官去了。女儿黛妮丝爱上了“赛纳”飞机厂的工人米肖，渐渐地，她认识到她父亲是一个卑鄙的政客，只要于他有好处，他是什么都肯干的。最近，她从报纸上读到了米肖在赛纳

工厂领导罢工的消息。她信任米肖，认为这次罢工是为了正义而进行的斗争。

米肖今年二十九岁，身材魁梧，脸上布满了雀斑。他有一双动人的，灰色的，嘲弄似的眼睛和耀眼的牙齿。他脸上老是挂着微笑，讲话时打着手势，“还有什么说的”是他的口头禅。

“赛纳”飞机工厂是星期六开始罢工的。整个一星期，工人们想跟厂方谈出个结果来。德赛尔答应加薪，可是拒绝了工人们的其他要求。他对米肖说：“不成，米肖先生！我凭自由的名义坚持。你要在我的工厂中或去或留，这是你的事，我要聘你或解聘你，这是我的事。”

于是，星期六，工人们不做工了。一万八千人集合在熔铁场前面的广场上。米肖站在一辆货车上，嘴巴凑到扩音器跟前，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要走散！我们一走，他们就找替工。我们一定要住在工厂里，在这里过夜——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直到我们胜利。”

几天后，罢工的浪潮波及了全巴黎。大工厂全部停工。有一百万以上巴黎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进行了一整天。半个城市没有警察。为了避免冲突，他们撤退了。游行队伍一个个走过去。“这是最后的斗争……”歌声久久地回荡在巴黎上空。震惊世界的巴黎工人大罢工就这样开始了。

正当巴黎工人庆祝罢工胜利的时候，西班牙内战爆发了。西班牙法西斯勾结德、意法西斯，大肆屠杀西班牙人民，德国的轰炸机天天轰炸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首府马德里。西班牙政府派蒙涅斯为代表，来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向他们出售几十架轰炸机，他们准备用来反攻。在德赛尔的操纵下，维拉尔终于以出售飞机将引起战争为理由，拒绝了蒙涅斯。这消息传开以后，巴黎工人个个义愤填膺。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第一批志愿军，开赴西班牙。

黛妮丝听说米肖要去西班牙，在晚上来找米肖。她已经离开了她所憎恨的那个家。

“米肖，我需要你，你一定要回来。”

米肖重新又振作了精神。

“当然，我要回来的，”他说。“我们会胜利的，我会回来。到那时候……”

黛妮丝突然扑到米肖身上，生硬地吻着他的脸颊。当他从惊奇中恢复知觉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

第一部完。

罢工继续发生。战争仍在西班牙进行。德国师团在维也纳的街道上进军。人人都在猜测希特勒的第二步行动。人们在咖啡店里焦急地争论，然后又安然地去睡觉。一九三八年春天的巴黎格外寒冷，但却显得安宁而令人迷惑。

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头子勃莱推依正在积极活动。整整一年来，他采取了种种恐怖和暗杀手段。他指使他的得力干将格立斯纳烧毁了六架军用飞机，在地铁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后他又命令另一个匪徒阿勃雷秘密除掉格立斯纳，并把一张共产党党证放在他的身上。右派报纸把这些暴行统统归罪于共产党，指责“人民阵线”正在把法国拖向战争。为了推翻内阁，勃莱推依还极力拉拢两个颇有影响的著名议员杜康和格郎代。他们在暗地里讨论未来政府的纲领：第一，要求戴沙必须停止和共产党发生关系，同时要跟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达成妥协；第二，控制报纸，限制贷款给飞机工业，工人工作时间要增加为每周六十小时；为预防工人占领工厂，要准备好武器，配备好警察。

戴沙对于勃莱推依的秘密活动虽有所知，但并不摸底。昨天，他庆祝了

他的六十岁生日，接到了无数贺寿的函电和礼物。一想到他很快就会成为国家的巨头之一，不觉心中洋洋自得。可是，家庭不幸的阴影却抵消了他的快乐。他的女儿黛妮丝离家后到一个工厂去做打包工人，据秘密警察长的情报，她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吕西央从西班牙逃回来，在姚利欧手下充当个告密者的角色。最使他生气的是，他发现吕西央偷了他的一份关于格郎代的绝密文件。想到他儿子竟是德国间谍的走卒，大丢他这位部长的面子，不禁恨得咬牙切齿！不过，他又想到他明天就要当部长了，于是，这一切忧愁一瞬间便消失了。

戴沙常常向别人说起法国安全的话，话说多了，他自己竟然也相信这句话了。当有人问他：“到底会不会发生战争？”他立刻充满自信地回答说：“一定不会发生！”

然而，战争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从布拉格发来的急电交给了。德国军队准备越过边境，占领捷克。法国政府内部四分五裂。共产党正在酝酿罢工。戴沙感到忧虑了。正在这时，勃莱推依来访了。勃莱推依态度十分强硬地对他说，决不能动员人民去同德国人作战，否则，法国的失败将不可避免。法国惟一的出路是跟德国人妥协。

勃莱推依走后，戴沙心中暗想：这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了。石派势力增大了。他请来了辟卡尔将军。辟卡尔告诉他说：“我们的飞机少得可怕。我们的飞行员训练得太差。我们的高射炮距离标准太远……”辟卡尔描绘了一幅德国入侵后巴黎毁灭的惊人图景。这使戴沙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他请来了德赛尔和他一起进晚餐。德赛尔这些年在事业上是每况愈下。他对法国的前途也是悲观的。他认为，法国只能让步。

不久，巴黎电台播发了政府关于青年应征入伍的通告。比埃尔刚好在安特莱的画室里听到了这个通告。他表示要去入伍作战，保卫法国。安特莱讲起他曾在咖啡店遇到一个德国人，他是鱼类专家。那天，他喝得醉醺醺的。他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德国人将把巴黎毁灭。安特莱认为这不过是他酒后的胡言乱语。

又过了些日子，比埃尔和妻子爱妮丝一起收听了电台播发的慕尼黑协定的短短的公报。在他们那座大楼里，每一户人家都围拢在收音机旁，屏住呼吸，等待着可怕的消息。可是现在，那广播员叫人们吃了定心丸，不必再害怕：战争不会再发生了。

“比埃尔，此刻有多少人在兴高采烈啊！还有德国也是这样。你以为他们的感觉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吗？求你忘掉那政治吧，哪怕是一会儿也好！”

爱妮丝走到儿子度度的身旁。他安静地睡着。她想：他应该好好活下去，活得长寿。

十一月的雾是黄的，棕的，黑的。郊外工人区那些倾圮的屋子潮湿得很。这一年秋天，一个绝望的波浪淹没了人民。政府总有新的法令颁布下来。工作的时间又增加了，加班的工资又降低了，各种税收又加重了。罢工时有发生。警察把罢工者驱逐出了工厂，拘捕了那些在罢工时担任纠察的工人，把他们列入了被告席，同时又把几个罢工领导人判了重罪。一种使人疲倦的寂静遍布在工人们聚集的小咖啡店内。曾经关心过西班牙人民的痛苦的人说：“现在要轮到我们的了。”

工会决定罢工一天。戴沙完全忘记了他刚刚死去的妻子，又变得活跃起来。因为他是镇压这次罢工的总指挥。政府宣告凡是参加罢工的都作为叛徒

论。他指使姚利欧在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次罢工是上了德国人的当。

在工厂附近走动着的警察，一小队一小队的特务宪兵分派出去守卫火车站、政府机关和邮局，在公共汽车司机的身边也坐着一个警察。人人都在谈论：严酷的判决，成群的囚犯和苦役……。

年老的工人们变得抑郁和悲哀了，他们担心罢工会遭到打击。然而，这一天对黛妮丝来说，却是经受斗争洗礼的第一天。她感到浑身充满了勇气和力量。

在一条横街上停着一辆警车。他们把逮捕的人推进去，还把一个工人的牙敲落了。他们撕破了黛妮丝的衣服。她对同伴们说：“同志们，我们的人不要走散！”警察搜查了她。一个留着胡子满嘴酒气的警察，伸出了粗大的手搜了她全身，还放肆地猥亵了一阵。她忘记她的受辱，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使罢工坚持下去。

夜里，戴沙接到监狱长的电话便匆忙赶来了。在监狱长的书房里，戴沙正站在一个石膏像旁边。黛妮丝给带进来了。一看她那狼狈的样子，他就感到一阵痛心的怜惜。他抑制住不悦的心绪，试着用温和而带些颤抖的声调说：

“黛妮丝，我来保释你。”

黛妮丝说：“释放我，你们就必须把别的囚犯一起释放。”

这句话，和黛妮丝的声调，以及她突然改用的“你们”，把他气昏了。他狂怒地喊道：

“释放那些暴徒吗？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吗？”

“谁是暴徒？你们见了德国人才简直是懦夫！我们没有准备，所以你们就用催泪弹！”

“你们共产党才是在替德国人做工作！”戴沙说。“昨天你们在罢工的时候，意大利提出了要求，要尼斯和科西嘉了。这就是你们罢工的第一个后果。”

“在替德国人工作的是你们！是谁关闭了飞机制造厂的？你们自己做的事，你们自然不肯说。你们还指使那些强盗……”

“说谎！恶毒的说谎！你这小傻子，他们告诉你什么你全都相信。绵羊啊！”

他叫骂了很久，然后他突然静默了。有什么用处呢？她是被这疯狂的主义弄得着了魔了，要她清醒过来是不可能的，但这件事决不能让报纸张扬出去，更不能提到判决，要知道，这有损于他的名声啊！

从这回以后，戴沙对于共产党的憎恨简直到了极点。他心想：共产党把黛妮丝从他那里夺走了，还把一个温和可爱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反对政府的煽动者。这种东西怎么能算是一个政党呢？简直是些地狱的魔鬼。要是不把他们消灭，他们会缠扰不休，他们会杀人放火的。

时间从来没像那个冬天似的走得那么慢。巴黎处在安静和猜疑之中。阴沉沉的十二月的黄昏笼罩了往昔那些光荣的纪念碑。

每天早上，部长老爷们照常在公文上签字，裁去一些不服从的电报生和火夫。各地工厂主都在裁减工人。成千成百的失业者为饥饿所吞噬。议员达拉弟虽然提起加强国防，可是军火工厂里的旋床却像魔鬼似的静寂。

法西斯头子里宾特洛甫到巴黎来访问了。为了安全起见，警察先清理了街道，所以这位来访者领略了一种奇异的景象：协和广场上空洞洞的，只有一个红红的冬天的太阳。他谦虚地说：“这一回的巴黎特别使我高兴……”

意大利的师团正在向巴塞隆那推进。议员们开了一个会，决定派参议员倍拉尔去访问弗朗哥将军。戴沙赞成这个决议，说：“这是消除误会的时候了。”

戴沙感到，他必须取得右派的支持。他想把勃莱推依拉过来，可是勃莱推依一天天地更精明，坚持着要曼台尔辞职。在一个体育协会聚餐之后，勃莱推依说：“唉，犹太人曼台尔依然是一个部长！他在耍阴谋，要我们跟德国人吵架。”戴沙连忙对曼台尔表示了歉意：“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勃莱推依是个狂人。他的头脑是东方式的。他生在劳莱茵区，就是这种脾气。可是我们都是笛卡尔派。我们不会有这种念头。”随后他又对勃莱推依说：“对的，对的，你关于曼台尔的话说得有理。这个犹太人终究是个外来客。”

维拉尔代表劳动委员会拜访了戴沙。维拉尔提到法国政府从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过。戴沙怒不可遏地说：“让共产党停止他们的活动吧。我们在安排和平，他们把一切都搞翻了。把几千人送进监牢比之几百万人去送死好得多。他们说的是预防战争，可是我的意思，哈，哈！我的意思是预防性的抓人！”

维拉尔摘下他的夹鼻眼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温和地看着戴沙说：“你真的相信和平吗？”

“我能说什么？德国人很可能东进的。这一来我们就有二十年和平。可是一个人的估计可能是错的。我自己就爱赌博，而目前恰好是我们自己变成了纸牌；我们给洗了一下，给打了出去。一个残酷的职业！我倒妒忌那些失业者，他们可以睡在桥底下，什么也不必想……”

维拉尔被他那颤抖的声音感动了。他跑到戴沙跟前热烈地握他的手，不无同情地说：

“从前有修道院。人们可以把自己关在里面，可以读书，可以思索宇宙的秘密，浇他们的花。可是现在到处也找不到这世外桃源了。”

第二部完。

严酷的一九四一年来到了。每天夜晚，巴黎人都被警报声唤醒。有人谈到他们已看到炸毁的房屋了。戴沙却微微一笑：“这仅仅是预防。德国飞机一过边境我们就拉警报。这可以教育巴黎人一种自我牺牲的观念。”许多人已离开了这个首都。贵族区空了，而诺曼第、勃列顿尼的海岸胜地却有人满之患。法国士兵调到东部去阻击敌人，而胆小的资产阶级则纷纷向西部奔逃。在招待外国记者的宴会上，戴沙做了一个演说：

“告诉全世界，我们的生活还是照常。没有大炮的吼声，我们唱的歌叫做‘巴黎依旧是巴黎’。”

在吃饭时，戴沙对意大利大使说，墨索里尼具有政治家的天才。法国和意大利应当联合起来，因为莫斯科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五月十六日黎明，戴沙的秘书告诉他，德国的坦克已经到了拉翁，接着又强调说：“他们在五天之内，共推进一百四十里。自拉翁到巴黎，一共是一百三十公里。”

戴沙大怒：“你怎么敢散播这种吓人的谣言！”他大叫：“我必须采取严肃手段。”

秘书一出门，戴沙就打电话给雷诺：“听着，关于德国人的事不是真的吧？”

“他们已经到了拉翁附近了。”

“那么，换句话说，他们要到巴黎来了。”

“那是没问题的。”

戴沙挂了电话，一头扑在桌子上，开始哭了。何等可怕的不幸啊！可怜的法兰西！怎么办呢！只好投降了。格郎代暗中勾结德国人，这一宝算是让他押着了。看来，只有贝当元帅来收拾这种残局了……

格郎代送走客人之后，松了松他的领带，在沙发上伸直了他的两腿。他很疲倦，不过事情却相当的顺利。他心想：等德国人占领了巴黎，他格郎代就要站在众人之上了。大家都要拍他的马屁了。在赌博之中，最要紧的就是看你赌得对不对。他却赌对了。眼下，他只要支撑这最后一刻钟就行了。这以后，就会有权力、荣誉和显贵。从客观上说，只有他能够挽救法国。他会减轻投降条件，给成千成万的人以和平存在的可能。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杜康那样的歇斯底里的狂言。他又想到他那不忠实的妻子摩希，便愤愤地走到病危的摩希床边，对她说：

“你以为我失败了，以为我是一个可疑的人物，一个间谍。公主，你错了。我是惟一可以挽救法国的人。”

摩希一动不动地躺着。她的头从枕上垂下来。

“公主为什么不说话了？说话啊，小婊子！”

他看见她的白色的嘴角上有小小的泡沫，初生婴孩的嘴上的泡沫一样。他鄙夷地皱了皱眉头，走了出去。

平静的，自由的法兰西不存在了。这个国家已经落在敌人的魔掌中。就在米肖作战的前线也可以看到废墟和哭泣的女人。现在国家蒙受了灾难米肖更加爱它了。萨伏依的山峰，在那里，他度过了童年，溪水潺潺，草原绚丽；还有巴黎，他自己的巴黎，灰色的屋宇和欢笑的城，还有黛妮丝呢。他知道他保卫的是一个有蓝眼睛，蓝得像阿尔卑斯山上的花朵般的柔弱的少女。他机械地念叨着：“法兰西……黛妮丝……”

米肖跑到战壕里鼓舞他的同伴们。只有三百个人了。德国坦克在进攻。米肖对战友们讲述他在西班牙的战斗经历：

“有时我们只三十个人对抗敌人一个营。坦克呢，我们只能用手榴弹对付。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有一个家伙叫彼彼，一起炸掉了六辆坦克。”

有一个士兵说：“你知道，你在这里是防守什么的。我是自动参军的。可是我究竟为谁死呢？我在保卫谁呢？——戴沙吗？”

米肖没有立刻回答。他自己也很烦恼，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

“不！”他坚定的回答，“我们将来再跟这些人算帐。可是，目前，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你看到那些女人吗？她们的丈夫跟我们一样，都在前线。我们不能撒手不管！共产党人一定要树立榜样。何况，抛弃这一切也不容易。”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了。敌人又开始进攻。米肖的手受了伤，他鼓励战友们说：“这没关系，我在西班牙见过他们，他们顶喜欢看人家逃走。可是法西斯不喜欢硬汉子。”

“你以为我们守得住吗，米肖？”

“我说我们守得住！”

又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米肖摇摇他的左手，上面满是鲜血。他抓起机枪，说：“再给他们一个连发！……德国鬼子，试试这个！”

中午，他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米肖决定跟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可是总司令部命令他们在天黑时撤离那个城市，因为军队要改编。米肖气愤地对他的战友们说：“卖国贼！他们要出卖祖国了。”

夏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德国轰炸机飞过巴黎。整个天空咆哮了。窗格子格格响。爱妮丝走到街上，看见人们在奔跑。在一面墙上，她看到了一张小布告：“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底下写着：“巴黎已宣布为不设防的城市。军事总督邓兹将军。”

一个长着满脸大胡子的肥胖的警察，笑呵呵地走过来说：“他们把我们留下来维持秩序。不设防城市的意思是他们不能杀人。现在他们快要求和了。”

一个工人读了之后大叫道：“卖国贼！他们做了一笔生意了！”

贝当元帅召集的国民大会在维琪开会了。法国政府签字妥协，答应了德国提出的一切苛刻的条件。和平条约宣布了。法国沦陷了。根据勃莱推依的提议，贝当元帅召集了这次会议，全国志哀一天。

在休息时，大家都围住了格郎代，向他谄媚。戴沙想起吕西央偷的文件。他皱了皱眉头。想到这小鬼头间谍竟成了法兰西的救世主，他不知是嫉妒呢，还是憎恨。

夜里，勃莱推依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想，他应该给德国进驻巴黎的肖姆将军写一份汇报。他坐到桌前，迅疾地写道：

“肖姆将军大人阁下：启者，鉴于英国党人与戴高乐分子之破坏活动，予意德意志军事当局应有所对策，以和缓本国人民情绪，大户人家之妇女，似应准予返居巴黎。卑职业有准备，以协助大人消灭英国间谍，共产党及戴高乐分子。附奉法国之不良分子名单一份……”

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爱妮丝等度度安睡之后，便坐到窗前沉思起来。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三个年轻的法国士兵。德国人正在后面追踪。爱妮丝立即把他们藏到几只大箱子里。德国兵搜查走了之后，爱妮丝为他们弄了吃的。可是，就在三个年轻人离开不久，法国警察又带着德国兵来了。他们带走了爱妮丝。

德军上校在审问时用她的儿子的生命安全相威胁。爱妮丝愤怒地指着他说：“你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德国鬼子！一个德国鬼子！”

上校气急败坏地喊卫兵把她带下去，对她说：“夫人，这是你的结局了。”

爱妮丝藐视地看了他一眼，回答说：“但却不是法国的结局。这不是结局。世上没有结局的。”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的早晨，安特莱离开他的画室走到大街上。巴黎虽然蒙受了屈辱，但还是美丽的。眼前的寂静使他惊愕。汽车看不到了。人们从没有过这样低声地笑过，低声地说过话。在黎伏里街的屋檐下响起了德国军人沉雷般的笨重的脚步声。女人们的脸色比以前更苍白了。安特莱想，巴黎现在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他回到画室，看到墙壁上挂着的一幅风景画：一个回转木马，一棵栗树，一盏灯笼，远处的光影。这也是七月十四日。那时候让妮特还在笑。巴黎还在跳舞，扬起了旗帜行进，还在希望。这是另一种生命，画得不错。这是他最好的作品。而且这是巴黎，巴黎还在。他们可以烧毁博物馆，他们可以毁掉这幅画——但巴黎仍照样还存在。

全书完。

爱伦堡在谈到这部作品时说过：“曾有一位批评家写道，在我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里有很多人物，但是没有主人公；我认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巴黎。这本书是我五十岁的时候写成的。”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作者写作本书的宗旨，那就是揭示出巴黎陷落，即

法兰西悲剧的政治、历史、道德的原因。

这部作品历史画面广阔，人物众多，但都是紧紧围绕陷落后的巴黎展开的。为了揭示主题，爱伦堡运用了对比手法，鲜明而深刻地展现了两个阵营、两个阶级、两种力量在国难当头的严峻考验面前的不同心理和不同表现。

以戴沙、维拉尔和勃莱推依之流为代表，构成了卖国求荣的反动营垒。他们对人民残酷镇压，对侵略者屈膝投降。他们是法兰西民族的败类，是造成法兰西悲剧的真正的罪人。小说用很多篇幅，描写了这类人物的卑鄙心理和叛卖行径。

戴沙是急进党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大资产阶级豢养的一只忠实的走狗。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卑鄙无耻、投机取巧、两面三刀——这便是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细腻地描写了戴沙和他的后台老板德赛尔在酒馆的一场谈话。此时正是法国大选的前夕。戴沙对德赛尔的话心领神会，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急进党独揽国会大权。

在德国法西斯进攻比利时、捷克等国的时候，他主张撕毁原来签定的同盟国协定，为了讨好德国而牺牲这些小国。他嘴里唱的是“为了法国和平”的高调，俨然是一个热心的“爱国者”，而实际上，他所维护的正是那些金融巨头的私利。在德国入侵法国、眼看攻占巴黎的前夕，他在公开场合一直重弹“巴黎依旧是巴黎”的老调，而暗地里，他却与格郎代、勃莱推依等德国法西斯的走卒相勾结，出卖了法国人民，签定了投降妥协条约，最终葬送了法兰西。

在反面人物中，勃莱推依是一个面目可憎的法西斯分子。在和平时期，他组织秘密的“火十字团”，暗杀共产党，破坏工人罢工，他是法国右翼势力的代表。在战争前夕，他勾结戴沙，打入人民阵线内部，从事颠覆活动。他还投靠德国间谍格郎代，推翻内阁，积极进行叛国投降活动。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占领巴黎之后，他更加嚣张，赤膊上阵，残酷镇压共产党和一切爱国人士，为德国主子充当忠实的鹰犬。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的典型。

如果说前面两个人物是外露的，一眼即可识破的反面人物，那么维拉尔则是一个隐蔽的，容易使人迷惑的反面人物。维拉尔号称“社会主义者”，并以代表民众利益的面目出现在国会中。共产党和人民阵线推选他当上了部长，而他实际上所维护的仍然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德赛尔对戴沙说，不要看表面上讲一大套社会主义理论，好像是在替工人说话，实际上，“维拉尔只是一张嘴巴。请他做部长他就立刻闭嘴了”。果然，当上部长以后，他总是以一个教师爷的身份出现，教训工人不要罢工，不要闹事；在大资产阶级的叛国活动中，他表现得软弱无力、无可奈何；在敌人入侵后，他则完全陷入惊慌失措、悲观失望之中。他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的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只能屈服于敌人的威力，充当敌人的传声筒。

与戴沙之流相对照，爱伦堡以热爱和崇敬之情，精心塑造了法国人民的优秀代表——米肖和黛妮丝、比埃尔和爱妮丝等动人形象。

米肖是赛纳飞机厂的技术工人。他年轻、好学，在工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优秀品质体现在他的一切言谈和行动中。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他是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英勇无畏，挺身而出，不怕坐

牢，不怕失业，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同资本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米肖身上，充分体现了法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诚实、坚强、无私、无畏。正是这些优秀品质，强烈地吸引了黛妮丝，使她毅然决然地抛弃那种舒适安逸的资产阶级生活，投身革命，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结成了忠实的伴侣。巴黎虽然陷落了，但他们对法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希望。他们深信，敌人的胜利只是短暂的，而法国人民将最终取得胜利。

比埃尔是赛纳飞机厂的一名工程师。在资本家掌管的工厂里，他的地位和待遇是远远高出普通工人的。但他从工人的英勇斗争中看出了正义的事业和他应走的道路。为了正义事业，他曾和资本家作过斗争（尽管德赛尔很器重他）；当德国法西斯侵略祖国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军队，离开了可爱的妻子和儿子，最后英勇地牺牲在保卫祖国的疆场上。他的妻子爱妮丝本是个教师，性格脆弱，不问政治，但她在丈夫牺牲后变得坚强起来。她不顾个人安危，藏匿过几个保卫巴黎的士兵，并因此遭到德国法西斯的杀害。她在死亡面前刚毅不屈，坚信法国将来一定会解放。优秀的法兰西女性的崇高形象顿时便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爱伦堡通过这些优秀人物形象的描写，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法国人民才是法兰西的真正主人，只有他们才能挽救法兰西，使它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部作品描绘了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一年这一段时期欧洲和法国的历史重大事件。爱伦堡熟悉法国，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但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对事件忠实的叙述上，而是紧紧围绕巴黎这个中心，细致而形象地描绘出一个个真实可信的场景：议会里的勾心斗角；工人区的饥寒交迫；议员和部长老爷们的叛卖活动；工人和共产党员奋战在保卫祖国的前线上；轰轰烈烈的罢工场面；争权夺势的国会大厅……作者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场景和细节，鲜明地塑造出几十个有个性的正反两方面的人物形象。面对历史场面大、人物形象多这样一种情况，爱伦堡采用了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艺术结构方式，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揭示作品主题的任务。这不能不说明作者艺术技巧的高超。仅从这一点来说，《巴黎的陷落》于一九四二年荣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也是当之无愧的。

《巴黎的陷落》出版后获得了很大成功。它很快就被译成了十五种文字。外国文学评论家派息斯在谈到这部作品时写道：“《巴黎的陷落》是一个光辉的成就。作者创造了一部法兰西思想，法兰西情感，法兰西口味，和他们中间最最典型的事物的大全”。

《暴风雨》

一九四七年，爱伦堡完成了描写战争的第二部长篇巨著《暴风雨》。这部作品于一九四八年再度获得斯大林奖金。

《暴风雨》主要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和战争期间法国、苏联和德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作者从描写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巴黎社会的情景开始，以悲壮的笔调和深切的同情，刻画了法国山河破碎的景象，歌颂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战士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小说描绘了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精神恐怖，优秀的人类学家、工程师和年轻的大学生也被迫变成了杀人的工具。小说着重描写了苏联人民反击侵略、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深厚的爱国主义。

《暴风雨》全书共六部。同《巴黎的陷落》一样，这部作品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场面，也没有中心的主人公，而是通过书中许许多多人物在战争期间的感受和活动，来揭示民主力量同法西斯主义的尖锐斗争，来展现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战争考验面前的种种表现和心理活动。

小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巴黎写起的。

暴风雨笼罩下的巴黎。苏联工程师弗拉柯夫被派往巴黎工作。他的父母曾长期在法国生活，十月革命后才回到苏联。他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他母亲为了不让他忘掉法语，回到莫斯科在家里也常常跟他讲法语，所以，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国话。

弗拉柯夫的青年时代正赶上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那时，他血气方刚，行动鲁莽，是一个头发蓬松的共青团员。他曾到过乌克兰参加集体化运动。在大学时，他被派到库兹涅茨克，在艰苦的环境中参加了新兴城市的建设。十五年前他父亲害肺病死了；他母亲尼娜勤劳工作，抚育儿女——小儿子伐西亚那时才十一岁，女儿奥尔佳只有六岁。尼娜在两个学校里教授法文，夜间作翻译。尼娜不但把弗拉柯夫看成她的儿子，而且看成她的朋友。她总喜欢跟他开怀畅谈。她把弗拉柯夫看作她的种种神秘情感的化身。

尼娜听说儿子要去巴黎工作，她激动得全身颤抖起来。她知道：他将要看到她度过青年时代的那个都市。临别时，她说：“你到蒙台梭里公园的时候，去看看靠近池边的一只椅子，入口处的第二只，在一棵树下，你父亲和我认识以后常常坐在那里。”弗拉柯夫微笑了一下，心想：“母亲忘记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到了巴黎，他惊愕了：眼前的巴黎正是母亲常常说起的那个城市。是呀，那椅子依然在她所说的地方……百岁老太太穿着拖鞋坐在街沿的长椅上，那边有一位戴着单片眼镜的绅士——这正是莫泊桑所描写过的人物……各样事物都似乎是这样熟悉，因此也似乎是不真实的。

弗拉柯夫感到迷惘了；莫斯科生活在一个暴风雨将临的警觉中。西班牙正在打仗，德国师团开进了维也纳林格大街，秘密谈判和军事调动，然后是慕尼黑会议……莫斯科人始终处于紧张的警戒状态之中，而巴黎人对近在咫尺的马德里的浩劫漠不关心。弗拉柯夫看见巴黎生活好像是游艺场里的木马转盘——旋转，闪烁，动荡到使人头晕目眩。这都市漂亮得好像正在举行婚礼的家宅，人们似乎不知道死亡正潜伏在他们的窗户外面。钓鱼人照样在塞纳河岸上打盹，流浪艺人照样在街头唱歌卖艺。繁华，喧闹，欢乐，奇异——这就是弗拉柯夫眼前的巴黎。

弗拉柯夫这次到巴黎，是要同资本家朗西安开办的工厂洽谈贸易，而这老厂正陷于破产的危急之中。在上一次经济危机中，一个名叫里翁·阿尔培的俄国工程师救了他，成了和他合资经营的股东。在这次新的危机中，朗西安丧失了很大一笔资金。为了挽救破产，他只能有两条出路：要么卖掉妻子马尔细林的庄园吉利诺提，要么就得接受一个德国人加斯东的投资，如果这样做，他就等于让这个陌生人吞并他的产业。眼下里翁又回苏联探亲去了，弗拉柯夫又来催货，可怎么办呢？朗西安是个乐天派，他决定先不去考虑这些，暂时拖一拖。

朗西安为弗拉柯夫的到来举行了家宴，邀请了各种各样的人士参加：诗人尼维尔、画家西木巴、著名人类学家仲马教授、共产党员工程师列戎、流亡法国的德国妇女安娜。他们海阔天空地议论诗歌的优劣、新戏的上演、烹调猪蹄的不同方法、美女……当谈到希特勒的时候，朗西安认为“不会再有战争了”。尼维尔说，慕尼黑协定是一件不幸的事，倘若打起仗来，布尔什维克们会把半个俄国让给希特勒来保全他们自己的。弗拉柯夫听了感到无法忍受，便反驳说：“谁也不想打仗。除非德国人……但是你的话是错的，尼维尔先生……或许我不懂艺术，但是我懂得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是不会投降的。倘若我们被攻击，我们就要打，打得叫你不忍想象……”

在这次宴会上，弗拉柯夫认识了朗西安的女儿美达。两个人一见钟情，从此以后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林荫道上漫步。在他们分别的那天晚上，他们又来到林荫道上那棵栗树下面的长椅旁。

“是的，战争就要到来，很快就要来了。”弗拉柯夫忧郁地说。

“我不管它。”

“‘万事如意，侯爵夫人’……那时一个炸弹或许会落在侯爵夫人头上，落在这长椅上……”

“这种前景使你感到高兴吗？”

“我很焦虑——焦虑巴黎，焦虑你。你像巴黎一样——是陌生的也是我的，是欢乐的也是不幸的，是聪明的也是愚蠢的。你将来怎么办呢？……你是这样……毫无准备……”

“你呢？”

“我吗？……在我们的国家里生活是不同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变动。我们将要挺住它。”

“挺住什么？”

“各样事情。”

“可我挺不住和你分别……”

巴黎消失在夜雾里。似乎爱情也消失了。美达搂着弗拉柯夫，亲吻他。他们两个人像孩子似地充满了欢乐。他们跑下坡，到了街上，最后还亮着几家酒吧间的微弱的灯光。他们站在柜台前面喝咖啡，在一群醉汉、汽车司机和工人们中间——天亮了，弗拉柯夫说：

“你的脸色苍白。不过你的眼睛炯炯有神，你的眼睛和你分离了，它们显出异样的……”

她用笑声回答。他买了一束紫罗兰花。花朵散发出夏季特有的稚嫩的香气。她和他分别的时候他们好像不经过苦恼的一夜似的。不过当美达睡在床上的时候，眼泪不觉夺眶而出——“他要走了，不肯带我去……”在昏睡中她自慰地想道：“一个炸弹会落——在巴黎，在那椅子上，在我头上……”

第二天，弗拉柯夫乘飞机回国了。此后他们再没有见过面，但是这次巴黎的相逢却成了他们一生难忘的回忆。

朗西安正在为面临的破产苦恼的时候，他的朋友贝蒂表示，他愿意毫无条件地帮助老朋友。朗西安知道贝蒂为人诡诈狡猾，尼维尔称他是“老练的政客”，列戎则骂他是“伪装的法西斯”。但他想到，贝蒂现在是法国最大的企业家之一，跟他合伙经营，前途是可以保障的。

事情发展的迅速，使朗西安头脑昏眩了。战争，灯火管制，妇女在车站上哭泣。儿子路易参加空军走了，妻子天天哭泣。报纸每天都刊登着令人震惊的消息——德军进逼华沙，占领捷克，眼看就要侵入法国了。不久，德国军队长驱直入，法国迅速土崩瓦解。朗西安一家决定撤离巴黎到外省去。

那是初夏的一个晴朗的夜晚。朗西安的汽车在都尔附近停下了——汽油用完了。正在他犯愁的时候，贝蒂奇迹般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又搞到了一辆大汽车。贝蒂说，德军先头部队离都尔还有一百五十多公里，朗西安太太身体不好，可以在这里睡一夜，他已经在都尔租定了一个房间。朗西安听了深为感动。原来，贝蒂一直热恋着美达，但美达对他很冷淡。所以，他就采取种种手段，取得朗西安夫妇的欢心，然后再向美达求婚。

贝蒂和美达结婚以后，两个人都觉得好像过路人似的生活在一起。美达总是那样冷静，不动感情。贝蒂情不自禁，想要得到一点温情。当初他指望时间会消除他们之间的障碍，可他很快就明白了：他永远也赢得不了美达的心。

美达时常出去。贝蒂妒火中烧，绞尽脑汁加以揣测。美达常常到郊区的河边上站着，想让河上吹来的风驱散她的忧愁，带给她另一种生活。她常常思念远在异国的弗拉柯夫。她对眼前的形势和生活感到迷惘，她想起了弗拉柯夫的劝告，找到了列戎，并参加了他领导的法共地下组织，同国内外的法西斯势力展开了斗争。

朗西安天性乐观，他听说老军人贝当元帅出来领导法国，他感到法国有了救了。殊不知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上台后，大肆进行卖国主义的宣传，结果巴黎没有放一枪便陷落了。朗西安听贝蒂告诉他说，德国人进入巴黎后秩序井然，他也打算回巴黎经营他的企业。这时，路易回家来探望母亲，可是，母亲马尔细林在几天前死去了。他听说父亲打算回巴黎替德国人工作很生气。朗西安说，他想为儿女们留下一笔遗产。路易说，他什么也不要，他要为保卫法国而战斗。他大骂贝当是卖国贼，这惹怒了朗西安。父子两人争吵了一阵便不欢而散。

贝蒂回到巴黎以后，很快就跟德国人合作了。他手下的各家工厂都在替德军制造运货汽车。贝蒂相信德国将要胜利。尼维尔也投靠了德国人。几乎每天早晨他都要到警察局去汇报。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嚣“要消灭共产主义怪物”。两个星期后，他收到一封匿名信：“尼维尔，你的名字已经列入卖国贼的名单。准备可耻地死去吧。战斗的法兰西万岁！”那一夜尼维尔久久不能入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变为另一个人，纯艺术的时代已经完了。流血是不可避免的，要么是我流血，要么是他们流血。”

巴黎人民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下过着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生活，随时都有可能被叛徒告密，投进狱中。然而，法国共产党没有屈服，他们领导着抵抗运动，面对着山河破碎的亡国景象，组织人民，同德国占领者展开了英勇斗争。法国的优秀儿女，以及同他们战斗在一起的西班牙人、德国人和从

希特勒集中营逃亡出来的俄国人，散传单，炸铁路，到处袭击德国侵略者。他们不怕坐牢，许多人壮烈牺牲。年轻姑娘莱奥汀，只身一人在巴黎街头击毁敌人一辆坦克，最后光荣牺牲。朗西安的儿子路易，战争一开始就上了前线。他深信，虽然“法国不打就投降，但在法国也有真正的法国人。”他先是投奔流亡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后又从那里同“诺曼底大队”的十几名飞行员一起到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在苏联，他遇见了在巴黎相识的弗拉柯夫。在一次战斗中，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美达也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当她听说由于贝蒂的告发而枪毙了十六个人之后，她向地下组织负责人陆克请求，让她去惩罚这个“德国走狗”。陆克考虑她是贝蒂的妻子，执行这个任务太冒险，准备让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处置他。美达坚持要去。她给贝蒂写了一封信，约他在勒比里饭店见面，好好谈一谈。贝蒂读完信，犹豫不决，他担心被暗杀。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字已被列入卖国贼的名单上。但是到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他突然决定去会美达，心想：说不上美达真的回心转意了呢。

勒比里饭店是一家小店，战前常来的是情侣和钓鱼者，现在很少有人来。贝蒂告诉饭店老板娘拉格兰吉太太准备晚餐，然后邀美达先出去散步。这是一个明月之夜，他们来到河边，周围静悄悄的。贝蒂一想到美达这几个月一直只身在外，恐怕另有新欢了，便怒不可遏地问道：

“在这一个时期你经历了一些什么——马夫之爱，或是下流无情？”

“很多……”

他觉得她好像摸索手帕而摸不到似的。她或许正在哭泣吧。他对她客气和容忍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在这很多之中，有十六条人命，”她说。

在他还来不及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他就已倒在地上了。第二天早晨，朗西安读报时惊奇地发现，他的女婿贝蒂被人暗杀了。他忽然想到：“假如美达杀了他呢？真可怕……”

此后，美达更加积极地参加游击队的活动，同时也更加思念弗拉柯夫，常常“超过距离，越过岁月”凝望着他。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她被捕了。在狱中，她坚贞不屈。游击队打进监牢以后，她同其他三十五名难友一起得救。战争胜利后，她回过一次家，父亲替她预备了舒适的房间和一大笔财产，要她留在家里。她回答说：“我现在已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

在德军占领巴黎期间，一切正直的法国人都投入了战斗。著名人类学家仲马教授已经年迈，但他积极支持自己的独生女玛丽参加地下反法西斯斗争。他感慨地说：“我们瓦解了，他们俄国人是出色的，坚持了下去，贝当却与疯子握手。在法国只有一半是人民，另一半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资格。”仲马由于爱国的言行被抄家，最后被抓到德国，投入了集中营。

牢房是昏暗的。仲马仔细考察了一番。他勉强辨认出墙上的一些字迹，那是用针或指甲刻画成的。“我为法兰西而死，景·莫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留心卡尔泰——他是一个内奸。”“告诉布洛斯的里斯太太，她的儿子作了他所应作的事，在临死之前怀念她。”仲马看了这些字，感到一种力量，他觉得他不是孤独的。因为有这样的人们，他也感到不那么可怕了……

第二天早晨，仲马听见另一间牢房里传来低低的呼唤他的声音：

“教授，乔治是一个大学生，听过你的讲演。他说他已经被判处枪决。”

他问候你……等着，他还有话说……他说他以你在这里这事实而感到光荣……”

仲马不觉一串眼泪流下来。他想到人的尊严，想到人是不能摧毁的这个事实。身体可以被粉碎，而人的高贵品质却是永存的……

仲马教授终于盼来了法国解放的那一天。

八月二十四日晚间，电台广播说：

“法国坦克车队正进入巴黎。”千百个巴黎人站在街上微笑。

“德国人已经投降……！”

“自由万岁！……”

街上的欢呼声接连不断。人们烧毁希特勒的画像，互相拥抱接吻。

德国投降后，仲马乘飞机回到了祖国。孟里洛特医生在检查完他的身体之后，惊叹道：

“真是奇迹！我简直无法想象你这样虚弱的身体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一定尽快治好你的病，不过你必须避免一切激动……”

仲马微笑着说：

“我必须再活两三年——我想要完成我的著作。扫除人种差别的胡说现在是很重要的。他们曾经把他们的迷信传播到全世界。至于激动，那是不能避免的——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使你吃惊的事——昨天我已经申请加入共产党……”

话分两头。且说法国沦亡以后，希特勒又把战火烧到了苏联。苏联人民奋起抵抗。战争初期，苏军往后撤退。德国侵略军由于暂时的“胜利”，趾高气扬地声言：拿下莫斯科已经指日可待，“让别人去惧怕暴风雨，我们就是暴风雨本身”。和平的居民面对敌人的枪炮，无畏地高呼：“红军会回来的！你们对此要承担一切！你们是野兽！”千百万男女青年纷纷要求上前线，有的人转入地下，有的人奔向丛林参加游击队，以各种方式打击侵略者。他们坚信“有党、有斯大林，法西斯一定要被击溃。”

弗拉柯夫的弟弟伐西亚离开新婚不久的妻子娜塔沙，上前线去了。里翁回到法国以后，他在苏联的弟弟奥斯普也到前线作战去了。奥斯普的妻子拉雅写信给他：“母亲和孩子已被杀害，如果战争延长到一百年，我将等待、等待、等待。”奥斯普脸上布满了忧愁和痛苦，但他极力克制自己，拿起报纸，对战士们宣读了一篇重要社论：《坚守莫斯科是苏维埃军人的最高义务》。然后，他对战士们说：

“营长的妻子来信说莫斯科现在是战争基地。像这里一样。她是学音乐的，必须保护她的手指，但是她也去挖战壕……所以我们必须坚守。莫斯科不但是防线，而且是这个……”他难为情地指指他的心口，他自己在想——真傻，好像小说似的……

这是在德军两次攻击之间的喘息时间。他们守这里已经九天了。前面一条小河……这算什么防线？甚至小孩也能涉水过来。最初一夜战士们挖了入口狭窄的深壕——仅仅能够挤进去。德国人一天攻击两次。周围没有一片完整的土地——炮弹坑紧连着炮弹坑。而最糟糕的是弹药不足——又供应不上。营长巴洛戈洛夫和奥斯普决定让德国人更挨近些——为的节省子弹。

德国人决定使用飞机。午后，天气晴朗，天边有一块暗红的云朵。奥斯普数着：三十四架……后来他停止计算。在从前人们必定把这看作好像世界末日一样：炸得天翻地覆……这些杂种有好多飞机呀？……他觉得眼前一片

漆黑，好像他的胸部中了扫射的子弹。他醒来的时候，戈里扬茨夫抱住他的肩膀，叫道：

“政委受伤了！”

“给我一点水喝，我渴……”

他喝了一口，觉得想要呕吐；他吐了。他的头痛得很厉害，他想要站起来，但是又踉跄地倒下了。

“巴洛戈洛夫……他被打死了……”

“什么？……”奥斯普忘记了自己的疼痛，一下子跳了起来。巴洛戈洛夫已经面目模糊。奥斯普站着，嘴皮动了动——想要说什么，最后他勉强地说出了：

“我指挥全营。”

夜间他们埋葬了巴洛戈洛夫。他们找不到一块木板，所以奥斯普用刀刻在一片铅皮上：“巴洛戈洛夫上尉英勇战死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放了一排步枪。德国人的回答是几支火箭。奥斯普想起了巴洛戈洛夫的梦话：“战争完了之后我要和克拉娃到阿留普卡去……”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他决定写信告诉克拉娃。

弹药快要用完了，而明天敌人又要来进攻。奥斯普对战士们说：“我们的任务是坚守阵地。”

天刚刚亮，敌人就开始进攻了。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奥斯普已经记不清了。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这里是国家心脏之地。我们要坚守，要挺住！……倘若各处都像这样，那么德国人就永远也看不见莫斯科。

可是，奥斯普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可爱的妻子拉雅在不久前牺牲了。

那是在七月战斗激烈的日子里。拉雅所属的师团撤离了基辅。拉雅已经成了一个优秀的狙击手。她先后打死了五十三个敌人。这一天她对自己说：我今天一定要达到五十四……

德国人又开始用重炮轰击。拉雅奉命去见上校。当她和通讯员穿过一片森林的时候，一颗炮弹打来，拉雅倒下了。拉雅被埋葬之后，她的步枪被庄严地赠给库兹尼索夫。他用坚定的声音说道：

“我发誓，一定要狠狠打击敌人……”

他的声音嘶哑了。他眨眨眼睛，像是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

“她经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杀了她的小女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高高举起那步枪，然后温柔地吻了吻它。

奥斯普接到了拉雅的团长的一封信，通知他她已经阵亡。信中夹着拉雅的照片，背面写着：“对于你我是始终如一的——基辅的拉雅。”那一天晚上将军告诉他：“我们就要被调到白俄罗斯第三战线。现在我们要把他们打到永远爬不起来……”

德寇逼近莫斯科城郊时，莫斯科人镇定自若：门窗上的玻璃震碎了，第二天就有人来装上，而战前却要等一两个星期；街道上有了弹坑，马上有人出来填平。希特勒没有料到十月革命节那天，莫斯科红场上照样庆祝，斯大林站在检阅台上，人们向他欢呼。德国法西斯感叹地说：“我们愈前进就变得愈困难，在法国刚刚相反。”

弗拉柯夫参军后在工兵卫队任少校，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几次负伤，多次立功，受到军部的嘉奖。每当他想起彼得里亚科夫少将授予他奖章的情景，他的心头总是充满了欢乐。他十分崇敬这位传奇式的

将军。他曾两次渡过伏尔加河去见少将。他朦朦胧胧地回忆起上次的情形：在十月夜间，冰天雪地，沉没的货船，死伤的战友，防守的工事……这一切真是过去了吗？……似乎不很分明……就在前天他们还怀疑能否再守一天；德国坦克爬来爬去。但是现在德国人掘壕深居，躲起来了。斯大林格勒大战告捷，德军元气大伤，战线转移到遥远的西部……他记起了少将那充满信心的话语：

“我们必须重新建设。这原是多么好的一座城市啊！你的专业是什么，少校同志？”

“造桥。”

“你将有很多工作……我想这里一座桥也不剩了。我在尼曼开始作战。我见过许多桥！我们建筑，建筑，然后……呃，你了解德国人的心理吗？我不理解。昨天他们送来一个俘虏——一个少校，书读得很好，但是谈起来就像一个野人。他们有多么好的大学和图书馆呀！可他们到这里来毁坏各样东西，现在又躲在壕沟里啃马骨头。他们简直成了穴居人！……”

伐西林柯在战前做过教师，他说：

“这是教育问题，将军同志……”

“你说得对。我们军人只学习作战。而我们的任务是限定了的：要训练好兵必须先有好人，但是我们不能制造人，人是在幼年就造成了的……战争初期我们打得不好，这不是秘密……我们能支持过来，那是因为士兵们素质好……我现在谈的正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人心……”

弗拉柯夫在回部队的路上久久地回想着将军的话语。这使他惊讶——一个军人，还谈论战后建设。

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后，弗拉柯夫随部队经过保加利亚，来到南斯拉夫。德国人仍在顽强抵抗。战斗正在各处进行中。比尔斯基将军对弗拉柯夫说：“河对岸的德国人大约有三十门自动炮，但是今天夜里我们的坦克必须冲过去。”弗拉柯夫立即命令他的工兵们建造一座载重六十吨的浮桥。敌人击毁了链锁，拖船被水冲走。弗拉柯夫冲过去拉住绳子，喊道：

“系牢在那树上！”

工兵们发狂似地工作。德国人仍在轰击。浮桥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建成了。部队冲进了城里。有几个南斯拉夫炮兵来报告，说德军残余正在爬出他们的洞穴，举起双手。街道上热闹起来，人们欢呼庆祝。弗拉柯夫由南斯拉夫一个名叫米尔科的游击队员陪伴着走在一条街上。他们后面追随着一大群快活的孩子，正在叫着：“莫斯科！贝尔格莱德！”突然，一阵枪声。弗拉柯夫立即猜到这是从附近一个地下室里打出来的。……米尔科站住，好像僵硬了似的。弗拉柯夫抓起挂在米尔科腰带上的手榴弹，用牙齿拔掉保险塞，把手榴弹抛进那地下室，同时他也跌倒在地上。一切歌唱和欢笑都停止了。全城居民，甚至连远郊的农民也赶来送葬。南斯拉夫一位上校在悼词中说：“这位苏维埃军官是为救活我们的妻室儿女而死的。”弗拉柯夫被埋葬在市内广场里的一棵老枫树下。他的墓上盖满了秋天最后的花枝——天竺牡丹和金莲花。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军全面投降的消息传来，莫斯科彻夜庆祝。弗拉柯夫的妻子瓦丽雅搀扶着弗拉柯夫那多病的母亲，伐西亚的妻子娜塔沙抱着小伐西卡，他们含着热泪，挤进欢腾的人民海洋。当晚，弗拉柯夫的弟弟伐西亚在暴风雨之后，也从柏林返回阔别四年的莫斯科，在礼炮声中同亲人

胜利重逢。

《暴风雨》这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描写了众多的人的命运和社会的重大事件。但整部作品都紧紧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两个世界的命运和人类幸福的问题。

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弗拉柯夫的观察和感受，写出了以巴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和没落。作家颇具匠心地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母亲听说弗拉柯夫要到巴黎去的时候，她叮嘱他一定要到她年轻时常常去的蒙台梭里公园，看看那只长椅。弗拉柯夫心里觉得好笑，因为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可是，当他来到巴黎以后，他的所见所闻却使他惊愕了：这里一切照旧。人们甚至对即将来临的战争毫无准备。这一细节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世界是停滞的，消极的。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细节所揭示的真理。它在侵略者面前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最后只能屈膝投降。

而以莫斯科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世界（其中包括法国人民、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则是积极的，前进的，不可战胜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苏联人民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不分男女老少，同人类最凶恶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决战。德军逼近莫斯科城郊时，莫斯科人镇定自若。基辅被占领以后，大批共青团员们神出鬼没地散发传单，到处袭击敌人。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是希特勒德国灭亡的决定点。由此苏联红军从退却转为反攻，到一九四五年打垮了法西斯德国、日本，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整部作品正是围绕着两个世界的命运这一中心，展示了不同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与《巴黎的陷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一个历史人物。爱伦堡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人。这些人物有缺点，有弱点，有着普通人的最平凡思想和经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感到这些人物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

弗拉柯夫的形象是作家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成功的一个。他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成长起来的。他是优秀的共青团员，在大学时参加过集体化运动。他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对社会主义祖国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当德国法西斯把战火烧到苏联国土的时候，他像千千万万苏联人一样，挺身而出，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在战场上，他英勇作战，多次负伤，成了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最后，在南斯拉夫，他为了保护街道上众多居民的安全，壮烈牺牲。他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受到了南斯拉夫人民的称赞。

弗拉柯夫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苏维埃人。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经历，反映了整个一代苏维埃人在卫国战争期间的思想、感情和经历。因此，弗拉柯夫这一形象是真正的苏维埃人的艺术概括，具有典型意义。

巴黎姑娘美达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出身于一个爱好艺术的资产阶级家庭。她热爱绘画，喜欢幻想，整日里过着无忧无虑、舒服自在的生活。这种环境促成了她那种热情、温柔、天真烂漫的性格特征。在她没认识弗拉柯夫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她那种悠然自得的艺术情趣之中，什么人间的不平、贫富的差异、美与恶的斗争等等，这些阶级社会中的常见现象，在她是全然不知的。她只知道美和艺术，她一直沉浸在绘画里面。因此，当弗拉柯夫谈起两个世界的时候，她感到不可理解；当弗拉柯夫谈起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时

候，她表示将信将疑。

弗拉柯夫的到来，使美达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认识生活。她在思想上出现了波澜，出现了矛盾。严酷的现实迫使她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弗拉柯夫关于苏联这个国家的介绍，使美达的眼界开阔了，她知道，在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完全新型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她了解到，在她所活动的圈子之外，还有另一类型的人——共产党人。无疑，弗拉柯夫对美达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影响。

在正面人物形象中，法国著名人类学家仲马教授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仲马教授是一位正直的法国学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坚定地站在法国人民一边，以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同侵略者和卖国贼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但全力支持自己的独生女儿玛丽参加地下斗争，而且，当他因爱国言行被抓进德国集中营时，他不顾年迈体弱，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并肩战斗。人们尊敬地把他比喻成“生长在法兰西的一株古老的峥嵘的乔木”。德国投降后，仲马回到了祖国。饱经忧患的仲马，这时看到了人类真正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他要求加入法国共产党。

其他正面人物，如奥斯普、拉雅、安娜、列戎等形象，虽然着笔不多，但都写得生动鲜明，读来使人感到亲切。

贝蒂、尼维尔则是另一个世界的代表人物。

贝蒂是法国可数的几个大资本家之一。他本是一家破旧的小厂的厂主，靠了他投机取巧和冒险的本领，积下了万贯家财，在法国企业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都说他“诡诈狡猾”。他对美达的感情，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因此，当美达和他分居以后，他气急败坏，当着朗西安的面，大骂美达是一个“娼妇”。作家通过贝蒂和美达的婚姻关系的描写，正是要揭示贝蒂这个伪君子在家庭生活中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在家庭如此，在社会上更是一个卖国求荣的败类。巴黎沦陷以后，他立即卖身投靠法西斯，为德国人制造屠杀法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军用武器。为了讨好主子向敌人告密。最后，他终于受到了人民的惩罚。这是一个卖国贼的可耻下场。

尼维尔是一个颓废派诗人。战前，他宣扬什么“纯诗歌”，而实际上，他的诗所描写的都是一些充满色情的东西。德国人打进巴黎，他摇身一变，成了法、德文化的“保护神”，暗地里，他却成了德国警察局的密探。到最后，他干脆赤膊上阵，在报纸上公开替法西斯的侵略行动辩护，并恶毒咒骂共产主义。尼维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文化走卒的形象。

至于朗西安这个人物，他属于第三种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不闻不问，逃避斗争，他一心惦记的仍是他的产业和钱财。事实证明，这种第三条路线是行不通的。朗西安的结局很悲惨：妻子在逃难中病死，儿子在空战中阵亡，女儿美达背叛了他的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

《暴风雨》这部巨著洋洋近百万言，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社会生活。为此，作家采用了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的艺术结构。一条线索是沦陷前后的巴黎，另一条线索是卫国战争前后的莫斯科。作家就是运用这样两条线索，展示了两个世界的斗争。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造成了小说情节的迅速变化，而这种变化恰恰适应了作品关于那种战争急剧发展的节奏的描写。

小说在艺术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家运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显然，作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直接描写战争场面和重大事件，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揭示各种人物在战争前后的心理和表现，从而展现出人物的命运。但是，作家不是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他总是把人物的行动、周围的环境和内心独白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读起来使人毫不感到枯燥乏味。

这部作品人物众多，许多人物出场和退场一闪而过，因此没有深入展开人物的活动和思想，使人感到浅尝辄止，这恐怕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缺陷。

文艺思想和艺术风格

一 文艺思想

爱伦堡的文艺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所发表的一系列文学论文里（当然，在他的作品和回忆录中也有反映）。这些论文是当时苏联文学界大论争中的主要焦点之一。他的文艺观和社会观代表当时苏联的一种社会思潮，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爱伦堡的这些论文，是全面了解和研究一九五三——一九六四年间苏联文学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所不可忽视的材料。

爱伦堡的文艺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的任务是写人

爱伦堡认为，文学的社会职能在于丰富人和社会的精神生活。书籍会改变人，会改变生活。因此，作家写的是人，而且是为人写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惟有在一个领域内作家比政治家、工程师、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或者农艺师更精通，这就是人的心灵的秘密——感情的领域。在爱伦堡看来，一些描写重大事件的作品，之所以没有给读者留下应有的印象，其原因就在于作家“没有把完成伟大事业的人表现出来”。读者希望作家对人的感情世界比他有更深刻的研究，希望作家有一双可与X光相媲美的眼睛。读者翻开一本小说的时候，希望能更深刻地认识他的同志、同时代人、朋友、敌人；他希望更充分地 and 更精确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生

活。爱伦堡举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现代的女青年读了小说，也会为安娜·卡列尼娜所受的苦难洒下同情的泪水。她懂得了一个深情的女子的薄命和母性的力量。这古旧的故事帮助青年妇女窥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列宁之所以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并不仅是为了暴露托尔斯泰哲学的破产，这位伟大的作家帮助他更充分地认识了人的内心世界。

爱伦堡在《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说：“人物的诞生——这是作家工作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环。这是复杂的过程，对待它，决不能像对待机械的生产一样。”

那么，怎么样写好人物呢？

爱伦堡指出：作家必须“找到打开他的所有人物心灵的钥匙”。为此，作家应该具有对于人的敏锐的洞察力，要像著名的荷兰画家伦勃朗那样，“不仅看到了他的模特儿的头发的颜色、皮肤、面部线条、衣裳，而且窥见了他们的灵魂。”作家“要能看出决定人的行为的精神状态，要能看出周围人所注意不到、常常连人物自己也意识不到的东西。这样小说家就可以创造人物性格，以活的人去充满小说的空间”。

爱伦堡反对人物塑造上的公式化倾向。他认为，“对人物用一种公式来表现，抛弃可能‘抑低’人物身分的一切而只说他如何奋发有为，如何取得了辉煌的劳动成绩，这样做，人物就不会真实”。为了防止这种公式化，他认为作家应该努力挖掘人物的心灵的奥秘，克服以主观的良好愿望代替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的不良作风。

（二）文学的倾向性

爱伦堡认为，苏联文学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倾向性，就是“对某种事物的爱好”。一个作家，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爱憎，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至于说，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有所区别，那决不是他的感觉麻木而是他的感觉敏锐。作家可能倾向于正义、理性、友爱；他可能倾向于社会不平等、黑暗、民族歧视，而把真正的感情寄托在贵族化的精神上，寄托在宗教信仰上，寄托在爱国主义上。作家必然要在作品中反映他的倾向性。

爱伦堡认为，“艺术家要是只知道孤芳自赏，他就不会再为人类的伟大珍品而奋斗。使得我们的某些艺术作品水平降低的，并不是倾向性，而是内心冷淡，缺乏真正的灵感，轻视人的感情和忽略艺术的法则”。

（三）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爱伦堡认为，真正的文学总是和社会生活联系着的。“社会环境决定着作家的思想、感情、生活和工作；脱离了环境，脱离了社会，作家在创作上就凋萎和毁灭”。有人说现代派作家不必熟悉生活就可以写作，爱伦堡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举了法国著名“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的例子。普鲁斯特是在一间不透声音的软木墙壁的房间里写他的书的。唯美派常常说这很理想。但他们忘掉了，普鲁斯特把自己关在软木房间里之前，先曾和人们在一起生活过，好好地研究过法国的上流社会。即使现代派作家在作品中通篇描写梦境，那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过已经歪曲或扭曲罢了。

爱伦堡又谈到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情况。他说，《战争与和平》是历史小说，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是在他诞生以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他是在档案库里研究过的。但是即使关于很久以前的战役的资料可以找到，关于兵士和军官的心情的资料却是没有的。托尔斯泰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参加者。当然，克里米亚战争不像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作家不能机械地把自己的心情和观察硬套到小说中去，不过参加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这件事帮助托尔斯泰了解了战争与和平的人物。而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却很难了解：参战者的情绪怎样，他们怎样克服恐怖，怎样在不断感到死亡逼近的情况之下过日子，怎样增进友谊，人们怎样变得更加粗暴同时更加敏感。可见，写历史小说没有生活积累和类似体验也是不成的。

爱伦堡为了证实生活对于作家的重要，他谈了一些青年作家的情形：有些青年作家在出版了第一本出色而有才能的书之后，他们的才华就早衰，有时候就不再出第二本书，有时候出了第二本第三本书，但是都使读者失望。这样的悲剧常常是和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的。一个积极参加生活的青年、工程师或者地质学家、工人或者大学生，体验过一些生活，看到过一些东西；由于他有才能，他把自己的经验运用到书里去，就一举成名。成为职业作家之后，他放弃了他以前所过的生活。不仅生活的观察的来源，而且体验生活的来源都断绝了。第二本和第三本书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它不是以经验为基础，而是依靠了推测、文学上的影响、现成的公式写出来的。文学史上那些大师能够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原因在于他们都走过了一段曲折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在官场中漂泊，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柯罗连科曾被流放，高尔基来自生活底层的“大学”……

这些作家都是带着丰富的生活素材进入文学领域的，这些素材足够他们写几十本书。因此，一个作家无论有多么大的才华，离开生活这棵常青之树，他决不会成功的。

二 艺术风格

爱伦堡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作家。他曾在欧洲担任驻外记者长达二十年之久。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具有广泛的阅历、深厚的艺术修养、渊博的文化历史知识和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他不仅从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而且受到欧洲文艺的熏陶。这就形成了他那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体现在他那独特的题材处理、主题发掘和形象塑造上，也反映在他那独特的情节处理、文学语言以及艺术技巧上。这里，我们仅就他的艺术风格中的主要特征介绍如下。

（一）变化迅速的故事情节

叙事性的文学作品的情节处理，是显示作家风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爱伦堡的几部长篇小说的风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情节处理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为标记的。比如《暴风雨》。这部小说是从暴风雨笼罩下的巴黎写起的。作家通过苏联工程师弗拉柯夫在巴黎的活动和感受，揭示了巴黎沦陷的内在因素：法国当局的软弱腐败和法国人民在精神上的毫无准备。小说描写这一时期法国和苏联的生活的情节进展是舒缓的、平和的。希特勒旋即入侵法国，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上台，巴黎陷落。情节从这时开始，急转直下，向纵深发展。接着，作家站在历史的高度，纵观整个欧洲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情节发展急速变化，一会儿，小说展现的是苏联人民在战前的积极准备；一会儿，小说又描绘法国政府的叛卖活动，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一会儿，作家的目光又注视到德国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人民……整个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宏伟场面，但作家通过许多人物在战争期间的感受和活动，真实地再现了战争期间欧洲的社会生活。在展示民主力量同法西斯的斗争中，小说情节忽开忽合，忽起忽落，忽张忽弛，大波大澜。这样的情节处理有利于表现那个暴风雨多变的时代特征。

情节处理是构成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爱伦堡为了表现重大历史题材而形成的这种独特的情节处理方法，显示了一个作家在艺术上的成熟。

（二）大量运用的内心独白

文学反映生活的独特形式是艺术形象。在形象塑造方面，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习惯的描写手法。爱伦堡善于运用大量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鲜明个性，反映各种社会因素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不同影响和渗透。

所谓“内心独白”，就是让人物自己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活动。这种方法能让人物的意识自然流露。西方作家常用的“内心独白”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内心独白，另一种是间接内心独白。爱伦堡在创作中常常是把这两种方式并用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爱伦堡在运用内心独白塑造人物形象时，比较喜欢选择富有时代色彩和政治意义的事件，笔酣墨饱地从正面、从高处加以铺陈渲染，有时还加入火辣辣的议论，力求把人物和事件写活说透，打动人心。这种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通过内心独白描写事件和表现人物的方法，既节省了作品的篇幅，又增加了作品章节的生活容量。

（三）充满哲理的议论插话

爱伦堡是一位政论家。这种政论家的风格也往往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苏联著名作家费定曾说过，爱伦堡是“一个哲学性格的作家。写一部小说而不加上推论和结论，也许会使他觉得乏味”的。

请看《十三枝烟斗》里的两段议论：

他的这个玩具不断在提醒我必须学会无情地去憎恨。每当我的嘴唇碰到这枝烟斗的时候，我总是要祷告，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做到以下一点：当我一旦看见白旗时，绝不像可怜的路易·卢那样把枪放下，而且为了保卫幸福的生活，只要还有三个英勇无畏的工人和一个吹肥皂泡的小娃娃仍然在上面坚持斗争，就绝不放弃文森炮台。

——《第二枝烟斗》

发生了战争。也许有人会选用“伟大”或“渺小”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这场战争，使之有别于过去发生过或今后将发生的战争。然而，对于生活在那个年月的人们来说，战争只不过是战争而已，无异于一场鼠疫，一场天灾。

——《第四枝烟斗》

第一段议论写在小说结尾。它通过路易·卢和他儿子的死，得出结论说：决不能听信敌人的谎言，对付敌人只有一个办法——坚持斗争。这样一段议论一下子便把这篇主题推到最高度。

第二段议论写于小说的开篇。它向读者预示，下面描写的这场搏斗的惨剧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这样，议论就起了点题的作用。

议论插话是文学的多样化的表现手段之一。爱伦堡恰当而巧妙地在作品中运用议论，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哲理的启迪，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四）言简意赅的景物描写

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景色，虽是取之于自然，但它却是作家加工过的自然，是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它的最基本特点是“人化的自然”。爱伦堡是深知此中奥秘的，因此，他常常借用自然景物的描绘来加深主题、强化人物形象。

爱伦堡描写自然景物的特点是：简洁、凝炼、寓意深远。这在《解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以小说第一部为例。

请看第六章结尾的景物描写：

街上月色分明，天气非常冷，仿佛呼出的气也会立刻结成冰，空中的鸟儿也会在翱翔中冻僵，像石头一样掉下来。索科洛夫斯基顺着寂静无人的、被无用的灯光照亮的街道往回走，浸沉在深深的伤感之中。

这是在索科洛夫斯基回忆他一生的不幸遭遇之后，插入本章末尾的。它向读者暗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严冬”的环境中。

再看第十六章结尾：

窗外是一片激动人心的情景。寒冬终于站不住脚了。马路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到处在流水。……

一切都立刻充满了生机，像在哄然萌动。

真可笑，薇拉马上就要回来，可我还没有考虑好该对她说些什么。我什么也不说。或者说：“薇拉，你看，到解冻时节了。”

这段描写是在官僚主义者茹拉甫辽夫倒台之后，它把索科洛夫斯基得到平反，眼望着“寒冬”过去，“春天”来临的那种欢欣雀跃的心情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